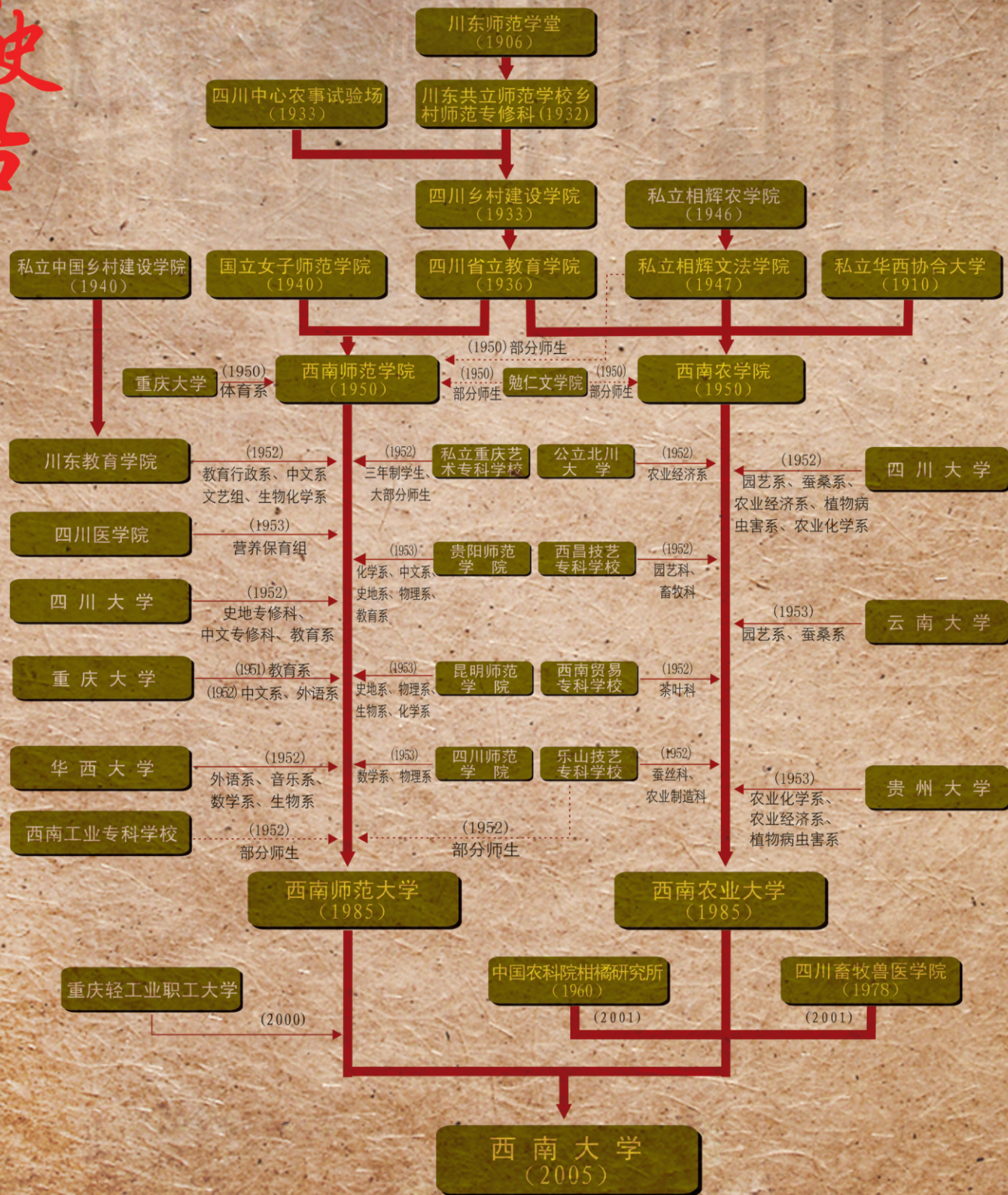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我国水稻遗传研究的早期开拓者
——管相桓



校史校情

侯光炯院士生前的一些旧事新闻
回忆我的父亲刘又辛先生
根植村社在大地上写文章

影像记忆

校园里的京剧爱好者

西大掌故

“文革”中的吴宓
西师：迁来北碚办大学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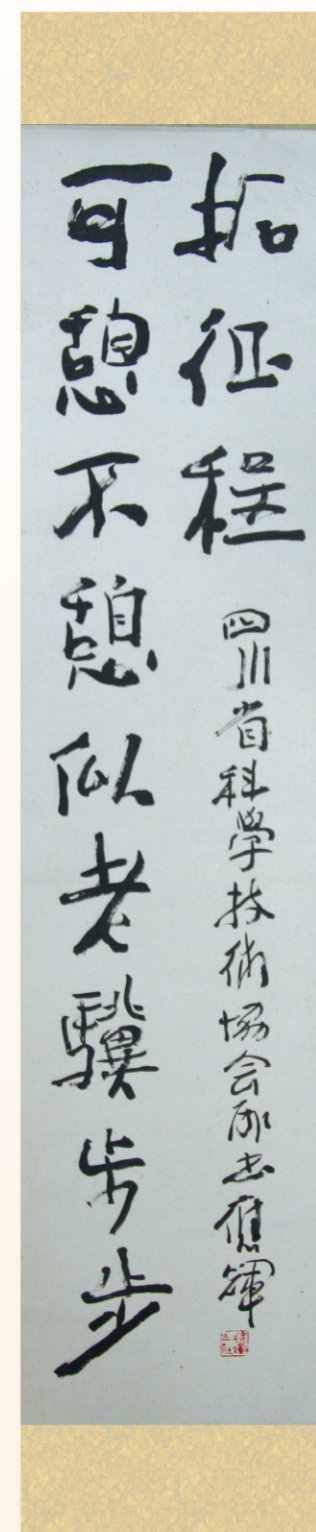
2012年第2期
(总第15期)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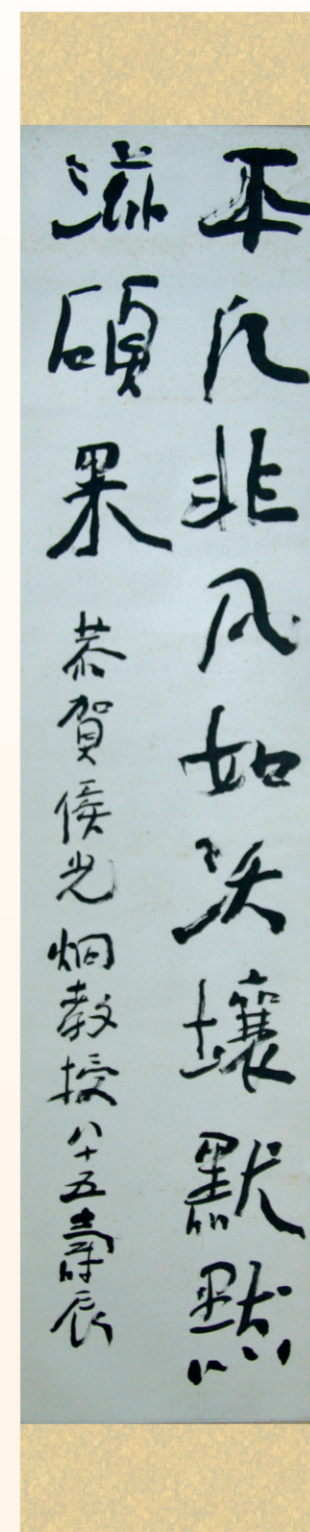


西南农学院、川东教育学院1952级毕业典礼¹

¹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0。



平凡·可憩联¹



何应辉/书

¹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HGJ-SW13-10、HGJ-SW13-12。

刊首语

□文/张晓华

渺渺人生如尘埃。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在上级的指示和部署下,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那个精神蔑视物质,无知讥嘲学问的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当作“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专政、受到批判,充斥着每一条大街小巷的标语、大字报,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喧闹的批斗声,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作为“恰逢其会”的知识分子,有的深入思索并积极向党进言,极力推动党去主动纠正错误;有的忍辱负重,在带着枷锁的跳舞中坚持著书立说,顽强地走出黑暗,迎来光明;也有少数人因不堪忍受屈辱和折磨,在迷惑不解、徘徊不安中以自杀的方式向残酷的现实作最后的抗争,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傲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后退只是暂时的,而前进才是历史的必然。在重新认识和梳理历史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尊重和正确地看待历史,在新的形势下继往开来。

西南大学记忆

2012年第2期(总第15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靳玉乐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吴 江

执行主编：张晓华

执行编辑：王 贤

编 委：邓 力 潘 洵 刘重来

编 辑：郭 兰 姚 恒 杨程程

刘 润 钟良鸣 姜海庭

肖 艳

美 编：王 贤

校训：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名师风采

4 我国水稻遗传研究的早期开拓者——管相桓

..... 张晓华

校史校情

9 侯光炯院士生前的一些旧事新闻

..... 江育璋 宋恩瀚

13 唯教育、学术是一生也

——记刘又辛教授 杨 军

15 回忆我的父亲刘又辛先生 刘 朴

19 校史求证 张晓华

20 西农的京剧活动 江育璋

24 乡建院独特的学生“四自会” 张晓华

28 根植村社在大地上写文章 林吉元

校友天地

35 热血忠诚 丹心向阳

——记达州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林森 孙玉侠

录

影像记忆

41 校园里的京剧爱好者 牟乔雅

西大掌故

46 “文革”中的吴宓 徐洪火

49 爱马成癖的李际科 方凤富

51 高显鉴创办《现代读物》 张晓华

52 西师：迁来北碚办大学 邓力

校史论坛

54 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的路径研究 陶莉

他山之石

57 民族魂在这里传承 姜海庭

封面人物 管相桓

封二 西南农学院、川东教育学院 1952 级毕业生典礼

封三 平凡·可隽联

——何应辉书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023-68250880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880

投稿邮箱：xdjy2009@126.com

邮 编：400715

照 排：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我国水稻遗传研究的早期开拓者——

□文/张晓华

编者按：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是我国著名水稻遗传育种学家赵连芳的学生，也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老师。上世纪 30 年代，他就开始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的研究，不仅搜集、保存了大量水稻品种资源，还首创了我国水稻性状遗传方面的研究，在稻作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而且为西南农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这样一位矢志科研、功在人民、名扬中外的学者，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恨九泉。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水稻育种科学家——管相桓。

管相桓是我国著名的水稻育种科学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已经开始水稻杂交育种研究，是我国水稻性状遗传研究领域的第一人，为提高我国稻作科学研究水平和水稻单位产量做出了卓著贡献。

一、幼年苦读

管相桓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天池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父母早故，管相桓幼时孤苦，生活艰难，一切全仗堂兄照顾。他读私塾、小学和中学的学费大部分来源于亲戚和师友的接济，大学与留学的学费则主要由同乡邓锡侯提供。

在亲戚和师友的资助下，管相桓才得以就学。因从小喜欢读书，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特别刻苦，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学习，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的勤奋好学为他带来了可喜

的成绩——在历次考试中均名列前茅。遗憾的是，因家中经济困难，管相桓并未在高小、乙种农校及中学读至毕业。

1923 年，管相桓考入营山县立中师范班。1925 年，苦于无钱继续读书，他转而投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师军事政治宣传队学习，4 个月后因不习惯军队的生活，遂请假赴成都投考学校，顺利升入四川省立高等蚕业学校。1928 年，管相桓在该校结业后考入江苏南通学院农科学习，再次结业后又赴南京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

二、与赵连芳的师生情

在国立中央大学，管相桓幸遇水稻遗传育种学家赵连芳老师。赵连芳是国际著名的水稻专家，1921 年进入水稻研究领域，是世界上较早开始研究水稻遗传的学者之一，其在水稻杂交理论与实践上均成



年轻时的管相桓¹

绩斐然。后来开创性的杂交水稻 IR8 即来源于赵老师著名的“低脚矮”。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水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 20 世纪初,我国由于科技落后,每年需向他国进口大米二千万担以上。国弱被人欺,帝国主义无视我国的存在,日本学者公然将中国的粳稻立名为日本型稻,将中国的籼稻定名为印度型稻。这令管相桓气愤万分。在赵连芳老师的影响下,管相桓立志为提高我国稻作科学和生产水平而奋斗终生。

在南京读大学时,管相桓一边学习,一边与 10 名营山同乡同学集资创办营山农场,并自任场长。后营山农场亏本,1933 年,他被迫休学去浙江省稻麦改良所任一年的技术员,并把自己大部分收入供给农场。一年后管相桓回到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复学,1935 年大学毕业后即赴日本留学。

初到日本,管相桓在东京东亚日语学校和程伯轩日语学校两处加紧补习日语,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后便在育种学教研组研习细胞学技术,并同时进行广东野生稻细胞学的研究及水稻高温处理,兼听遗传学及细胞学课程。1937 年管相桓转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遗传学教研组学习小麦的细胞

学研究工作,加做燕麦的爱克斯光照处理,并继续广东野生稻细胞学研究及水稻高温处理,直到“七·七事变”后回国。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随中央农业实验所迁到重庆的赵连芳担任技术主任兼稻作系主任,并兼任设在成都的四川工作站主任。赵连芳把工作重点放在四川工作站上,广纳农业专业人才并从多方面筹措经费,扩大农业发展计划,把稻、麦、棉、蚕等良种推广工作普及至 50 多个县,既奠定了四川农业改进的基础,又增加了抗战军民的衣食供应。学成归国的管相桓在老师赵连芳的引荐下,进入四川省稻麦改进所任技正(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农艺师)兼主任,主持全川稻作改进事宜。他非常注重水稻、小麦、荞麦、鹅观草的研究工作,后专门研究稻作。

1938 年,四川省政府成立农业改进委员会,聘请赵连芳为主任委员,之后又将农、林、牧、渔等 9 个农事机关合并,成立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由赵连芳兼任所长,管相桓任技正,主持稻作改进工作。自此,管相桓和老师赵连芳一起致力于四川的农业建设工作。

三、推进全川农业建设工作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解决军需民食的任务更为迫切。管相桓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大量科研工作,大力推广优良稻种栽培,积极培养农业建设人才,为四川农业建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7 年,管相桓主持全川地方农家水稻品种检定工作,并成立育种研究室。在主持参加四川省地方农家水稻品种的搜集、普查、比较研究及检定工作时,他组织人员分组深入农村,并亲率一组同志跋涉边远县区,历尽艰难险阻,对各县之地势、河流、水利、土质、稻田分播、品种类型、特性、耕作栽培特点等方方面面进行考查,于 1937—1940 年间完成 59 个县的农家水稻品种检定,共检定 4238 个品种,并从中选出特殊的、优良的地方农家水稻品种,育成 20 个水稻良种。在此基础上,管相桓还主编了《四川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48。

名师风采

省水稻地方品种检定汇编》一书,该书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至今仍是研究四川水稻品种资源的珍贵历史资料。

管相桓一向吃苦耐劳。春夏他在乡间作检定调查,秋冬则领导室内考种,每年旧历元旦还要办几天劝农会。他搜集、保存了大量的水稻品种资源,其数量之多为当时全国之冠。更进一步,他从中选出适合于四川省各自然生态区的高产品种并及时推广,为当时四川粮食增产做出了杰出贡献。川东南新培育的双季稻,川北种植的晚稻,都是他主持选育的品种。

管相桓在国内进行的水稻科研工作亦属空前。1941年至1947年,他全力以赴地进行水稻的细胞遗传研究,特别是水稻性状遗传方面的研究,实为国内首创。他作水稻连系遗传研究,曾创立第六连系群,并得到四川省政府传令嘉奖。他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过许多关于农业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稻作方面的文章。1946年,他在水稻遗传学的研究中揭示出水稻的芒性与叶鞘色、米粒色等10对基因之间无连锁关系,为水稻的遗传育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发表的《栽培稻芒之连系遗传》一文,获得1946年国家应用科学二等奖。

此外,管相桓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切身实践,对籼粳稻的不同特性、品种间杂交着粒率、应用光照处理调整亲本抽穗期、加速育种世代进程以及鉴定杂种后裔之特性等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至今仍为国内外同行专家及有关专业书籍所引用。

不单自身研究成绩斐然,管相桓还致力于为我国培养大批优秀农业科技人才。他先后兼任过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金陵大学农艺系教授等职。1938年,管相桓在华西大学农业专修班任教。1941年,华西大学成立农业研究所,农业研究所下设农艺、园艺、畜牧三个组,管相桓任农艺组组长。1945年华西大学将农业教育纳入本科体制,在理学院设立农艺系,农艺系下设作物、畜牧、园艺及农经四个组,由管相桓担任农艺系系主任。管相桓与几位热心

农业教育的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培养出一批批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人才。

四、奉命创建西南农学院

为进一步深造,管相桓于1947年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农艺系之聘担任研究员,同时以继续在川服务10年为条件,得到四川省政府补助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部分费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刚修完博士学位的管相桓没来得及交毕业论文就毅然放弃美国的高薪厚禄,重返祖国,希望能献出所学,振兴中华。回国后,看到党对发展教育事业如此重视,管相桓深感祖国大有希望,精神振奋之余,坚信自己农业科学教育之宏愿终能实现。

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计划在重庆设立西南农学院。而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在解放前就计划逐步紧缩该校农艺系,停止招生,并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在得知该计划后,管相桓代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农艺系师生向前来川西视导高等教育的西南文教部高教处处长陈孟汀要求归并到重庆,并将该系所有仪器和图书全部捐献给西南农学院。西南文教部考虑到当时四川大学农学院已有基础,而西南农学院是新设立的学院,为了调剂人力物力,遂表示同意。1950年9月,奉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令,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艺、园艺、农产制造三系为基础,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农艺系与私立相



西南农学院、川东教育学院1952级毕业生典礼(第二排左九为管相桓)²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0。

辉文法学院农艺系合并，成立西南农学院。私立华西协合大学随即将管相桓、何文俊等9人及农艺系在校二、三、四年级学生40人调入西南农学院。

1950年11月，西南农学院成立工作委员会，任命管相桓为农艺系主任，12月9日西南文教部又任命管相桓为教务处副主任。为解决永久性校址问题，学院于1951年2月成立新校址筹建委员会，管相桓为副主任委员。1951年11月1日，学院成立院务委员会，管相桓任委员兼副教务长。同年管相桓当选重庆市人民代表。1952年院系调整后，管相桓又任农学系主任。肩负着双重行政职务，同时还兼有教学工作，管相桓的繁忙劳累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在西南农学院初创时期，为使学校早日成立，教学步入正轨，管相桓不辞辛苦，日夜操劳，不仅到各地调查情况，四处延聘教师，而且不分寒暑、无舍昼夜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曾闲度一个节假日，即使患病也坚持著书立说，坚持从事实验研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全身严重浮肿，因常下水田观察记载而得了致人奇痒难耐的皮炎，还有时时发生的头痛、腰痛病等，他都置之不顾，一刻也不肯放下手里的工作，为西南农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袁隆平敬重的老师

管相桓不仅学识渊博，专业技术强，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而且廉洁奉公、热心助人，经常对有困难的师生解囊相赠，深受师生敬重。他也是袁隆平所敬重的老师之一。

西南农学院诞生后，就读于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农艺系的袁隆平随该学院的农艺系和农业专修科一道并入这所新型的农业高等学校，进行遗传育种的专业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颇大的管



管相桓(第二排右三)与农学系老师合影³

相桓老师。袁隆平进校时，管相桓是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系主任、教授，遗传学教研组长，讲授“进化论”、“达尔文主义”、“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等课程。管相桓是袁隆平的任课老师，袁隆平的遗传学基础理论深受管相桓老师的影响，特别是管相桓的“水稻的出路在于杂交”的思想对袁隆平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当时我国学习苏联经验，一切向前苏联看齐，在大学里不准讲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只能讲前苏联学阀李森科的一家之言。李森科崇尚米丘林学说，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利用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抵制并批判主流的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在我国所谓“一边倒”的社会环境中，管相桓所研究的基因遗传学遭到扼杀，并被勒令放弃孟德尔、摩尔根的理论，改教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然而，管相桓崇尚的是孟德尔遗传学，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颇有看法，他曾说米丘林的“环境影响”理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因此，他一再叮嘱袁隆平等一大批学生要好好学习《GENETICS RESEARCH》(遗传学研究)。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到湖南省怀化地区的安江

³ 图片由牟乔雅老师提供。

农校任教。在湘西偏僻的农校里,袁隆平没有忘记老师的嘱咐,认真阅读《GENETICS RESEARCH》的英文原版,并利用大量课余时间阅读国内外多种农业科技杂志。在广泛的阅读中,袁隆平开阔了视野,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并有意识地将不同学术观点进行比较,后又开始自学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在学习过程中,袁隆平多次去请教管相桓老师。而对于袁隆平的问题,管相桓老师每次都是非常耐心且认真细致地一一作答,给予他很大的帮助。最终,袁隆平这位年轻的农校教师,既可以在课堂上详细讲解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在遗传育种领域的应用,又能够在实践中实施他的“杂交水稻”之梦。

六、含恨于九泉

20年代50年代中期开始,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学院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管相桓和园艺系的李友霖,教务长蒋书楠等知名教授曾积极向党进言,批评一些党政干部办事不讲方式方法;认为党不应对学术问题干涉过多,把诸如遗传学的学派之争上纲为政治问题;并讨论“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提出“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其勇气可嘉,其忠心可表。然而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他们却错误地受到了重点批判,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给他们本人造成严重的不幸。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管相桓被错误审查,一度蒙冤,次年得以平反。

1957年春,在青岛全国遗传学会上,中央指示:两派遗传学(苏联李森科主张的米丘林遗传学派与美国摩尔根遗传学派即“基因学派”)均可自由研究。由此,管相桓得以继续研究他的基因遗传学。遗憾的是在当年鸣放反右中,他又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不仅被撤销院务委员、系主任、教授等职务和职称,工资也由高教三级降为六级,直到1961年才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即便如此,管相桓不计既往,仍然以满腔爱国热

情重新投入到工作中,积极从事实验研究,不辞辛劳地著书立说。他购置了大量的专业理论书籍,单是订阅的中、外文刊物就有二十余种。他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通读细研,穷理潜思,凡是看过的书均过目不忘。其学识之渊博,令人敬仰。

管相桓从1961年起开始编纂的《稻作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参考书,该书涉及稻之起源、分类、形态、生长发育、生理生态及遗传育种等各方面的系统知识,每一内容均参阅国内外有关资料,并系统总结国内外科研成果。《稻作学》全书二十余万字,到1966年才完成编纂并约定文稿付印。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管相桓被多次抄家,书稿毁于一旦。另外一部经他多方搜集大量资料拟写的《水稻细胞遗传学》也遭搜洗罄尽。这实在是我国农业科学的巨大损失!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1966年10月14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年仅57岁的管相桓吞服毒物,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15日去世。一位热爱祖国、矢志科研、功在人民、名扬中外的学者,就这样含恨九泉,而他所搜集和保存的那些万金难求、不可复得和再生的绝世珍宝——水稻栽培品种和野生稻品种及其所育成的多个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也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视作“资本主义的苗子”彻底销毁了。

1979年,管相桓终于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只是斯人已逝,唯留下遗憾种种。

参考资料:

- [1] 谢玉康、郭受棋. 营山文史资料选集, 1989。
- [2]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03-SW-1404-001。
- [3] 袁隆平、辛业芸. 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袁隆平口述自传.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姜海庭 王艳艳)

侯光炯院士生前的

一些旧事新闻

□文/江育璋 宋恩瀚



侯光炯院士夫妇在西农黄树村家中(1964年)¹

1.“文革初期”，学校一些年轻气盛的学生受外地红卫兵风潮的影响，将一些比较知名的老师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侯老师也受到冲击甚至挨打。有一次侯老师被还勒令第二天要戴高帽子，因侯师母(名黄景贤)生病，侯老师自己又不会做，所以很是为难。陈兆畦教授也被勒令要戴高帽子，当他知道侯老师的情况，就嘱咐陈师母多做一顶，晚上悄悄地送给侯老师。第二天，很多老教授都被集合在一起，戴上高帽子游校。这件事是陈师母后来告诉我

的。陈师母还说：侯师母身体不好，侯老师白天要劳动，晚上要集中到土化系办公楼去写检查，没时间照顾侯师母，给侯师母做点病号饭都困难。陈师母有时做一点稍好的饭菜，晚上给侯老师家送点儿去。

2.“文革”期间，侯老师除了人身受辱，还被勒令参加劳动改造。我和另外几位老师也和侯老师在一起参加劳改。那段时间，侯师母身体不好，侯老师没有请假，仍和大家一起劳动。所以，我并不知情，更没有前往探望。直至侯师母去世后，侯老师悄悄告诉我：师母在弥留之际，因发高烧，侯老师得不时给师



侯光炯院士风采(20世纪80年代)²

¹⁻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校史校情

母量体温。当时,侯师母已很难受,示意侯老师不要给她量体温了,侯老师只好无奈地拉着师母的手,陪坐在师母旁边。

后来听说,师母去世后,侯老亲自拉着板车送师母到梅花山殡仪馆。我作为侯老师的学生,就这样一点忙都没帮,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讲!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偶尔从旁听到侯老师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她走了也好,免得她一直担心地看着我受苦、受欺。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理解侯老师对师母的深情!

3. 师母去世不久,侯老师的小女儿回来看他,侯老师很高兴。在劳作之余,侯老师对我说:小翼送给他一样很舒服的东西!见我猜不到,侯老师笑眯眯地说:小翼给了他一双鞋垫!鞋垫很好,打湿了还可以拿出来晾干再用哩!看着侯老师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倒是有点难受了!

不久,侯老师搬到了他原住房后面那间最小的房间(最多五平方米),房里只放了一张当床睡的沙发和一张小书桌。吃饭上伙食团,可晚上去公厕怎么办?他眼睛不好啊!

4.“文革”期间,我们被要求劳改,穿旧衣服是很正常的。有一次,我发现侯老师穿的衣服扣子有点异样,仔细一看,发现那“扣子”不是扣子,而是一排回形针。我能猜得到,肯定是扣子都掉了!侯老师找不到扣子,也找不到针线。像我这样的学生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也不敢让侯老师把衣服拿给我帮他钉扣子。那时我也在劳改队,相互之间都要回避一下,叫做“划清界限”。如果当时有人帮侯老师把那一排回形针取了,钉上扣子,我会很佩服。如果没有人敢去钉扣子,我也理解。当时的极左思潮泛滥,谁不害怕啊!

5.“文革”后期,侯老师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为了弥补“文革”中耽误的时间,他拼命工作,有求必应。如歌乐山林场请侯老师去考查阿尔及利亚赠送的油橄榄树在本地生长优劣不同的原因。这次野外实地考察,我有幸与侯老师和其他老师(如牟树森、何庆邦等)同往。侯老师以“万物土中生”的观点,从



农村讲课(20世纪70年代)³



和西南土壤普查顾问组在云南(20世纪70年代)⁴

研究橄榄树生长的优、劣对比树根生长下的土壤状况入手,查出了生长好的橄榄树其所植的土壤经过了深挖,其树根在土中能自由伸展以吸收水分和养分,故生长茂盛。而生长差的则是赶栽种进度、土层深挖不够。

6. 除了为重庆地区的一些农业生产出谋划策外,侯老师把主要工作放在农村基点上,以便用较长时间定点定位研究某地区的天、地、人、物间的相互关系。如简阳、长宁都是侯老师的主要工作场所,尤其是在长宁相岭公社。除了以上研究工作,侯老师还带了多届西农土化系毕业生的生产实习并指导他们写论文。工作越忙侯老师越觉得过得有意义。在简阳、长宁两地先后陪同侯老师工作的有土化系王祖

^{3,4}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SX12-18。

谦老师、黄世坤老师、高明老师,重庆土壤研究室的朱传真老师、郭永明老师和李印先老师等,行政工作方面有邬宪章老师和罗召林老师。

7.侯老师在简阳蹲点期间,因事和一些老师乘火车返校。侯老师当时身着旧中山服,手提一个装有馒头的塑料口袋,走到卧铺车厢门口时,被列车员上前阻止。随行的老师对列车员介绍:这是我们西南农学院的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列车员用疑惑的眼光查验了侯老师的车票后才放行。对此侯老师没有不悦,笑眯眯地任由随行老师搀扶着上车去了。此故事是王祖谦老师生前对我讲的。

8.侯老师喜欢穿中山服,我发现这些衣服不单有些旧了,而且前后衣襟,包括右肩膀上几乎都有小洞。那些衣服上的小洞是怎么形成的呢?据我观察:侯老师常抽烟!他实际上不会抽烟,是“熏”烟而已。他喜欢边“熏”边思考边讲解。有时香烟灰长长的,还带着火星就掉在衣襟上,有时候老师会直接将烟灰往右肩后弹!这些偶尔带有小火星的烟灰落在衣服上,久之就被烧成小洞了。我虽看见了,但也不敢去拍打那些烟灰,以免打断侯老师的思路。有时也是想让侯老师打个盹吧!

9.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侯老师作为人大代



指导学生进行田间诊断(20世纪80年代)⁵



在墨西哥出席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会(1994.7)⁶

表赴北京开会。在电视的新闻节目中,我偶然看到在人大代表们进入大会堂的队伍中,急匆匆地走出一位身着中山服、左手夹着一个黑色文件夹的代表,很像侯老师,但又不十分像。我一直盯着看,觉得这位代表就是侯老师,只是嘴形不像。侯老师回校后,我带着好奇心到侯老师家探望。进门一看,侯老师又恢复成我们熟悉的模样了。我问侯老师他的牙是不是镶过的?侯老师笑着说:他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镶的,但不习惯,所以回来后就不戴了。

侯老师还在他家(有时在外面饭店)请过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他的学生和朋友吃过饭。他儿媳武丽华说:侯老师喜欢吃豆腐,他自己还会烧豆腐哩!就是嘛,侯老师牙不好,菜一定要软一点才行。

10.1994年,侯老师应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会的邀请,要到墨西哥去开会。土化系领导考虑到侯老师的眼神不好,年事又高,除了派刘夜莺(男)老师陪同之外,还给侯老师买了一根手杖!侯老师很高兴。当时有好几位老师都在侯老师家,嚷着要侯老师拿起手杖走走看。侯老师笑着手持手杖,很神气地在他住的卧室来回走了一圈。大家热烈鼓掌!

这次去墨西哥开会,侯老师带了论文。由于去得较晚,没法按大会要求将论文摘

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8。

⁶ 图片由余杰老师提供。

校史校情

要写成板报挂在墙上让大家观看。后来大会特别安排侯老在小组会上发言。会议结束后侯老师取道美国,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安排回国。这是侯老师告诉我的。侯老师还说,当年他去墨西哥,由于经济不宽裕,他女儿给了他两千美元备用。会议结束后,已捉襟见肘了。由于墨西哥离美国很近,侯老师听从美国朋友的建议,去了美国,由中国大使馆购机票回国。

11. 侯老师特别喜欢听郭兰英演唱的歌曲,如“南泥湾”等。侯老师在长宁县过八十八岁大寿时,长宁县委还专门嘱咐长宁县电视台播放了多首郭兰英演唱的歌曲。侯老师还喜欢听广东歌曲《酒干淌卖无》,不时还哼唱几句,其中有句歌词是:“…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真是意味深长啊!

侯老师还会拉二胡,他曾在我们家用京二胡拉了几段他老家江苏一带的民间小调,还拉了一段京剧二黄原版的老过门,拉得有滋有味的。

12. 侯老师对青年教师颇为关心。侯老对青年教师除了进行业务方面的指导外,对他们的生活、家庭、以及身体病痛诸多小事都很关心,并经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对一些年轻教师家庭长期分居,相互之间及孩子老人等无法照应,侯老师总是尽力帮助解决。又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赵红霞老师生孩子,由于毕业不久工资较低,生活比较拮据。侯老师叮嘱家人买了一只鸡送去,赵老师非常感激。对这件事赵老师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侯老师对我老伴宋恩瀚的关心。宋恩瀚也是侯老师喜欢的学生之一。老宋长期跟随侯老师在云、贵、川进行土壤调查,在白市驿、井口等地农村驻点搞低产田改良、搞市委高产示范区,以及参加中科院综合考察等工作。不幸的是老宋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因眼病双目失明了。侯老师感到十分惋惜,他不单在来信中安慰老宋好好治疗,而且每次侯老师从农村基点回校,只要有空,都要亲自到我们住的四楼来看望老宋。侯老师对老宋说:他相信,随着医药科学的发展,老宋的眼病是治得好的。侯老师还说:等老宋的眼病治好了,他还要老宋和他一起到野外搞土壤调查。他有时在报上看到或听到有关治疗眼病方面的消息,都要告诉我们。例如侯老师听说现在可用激光治疗青光眼,马上就告诉我们。侯老师一番诚挚的心意,使我和老宋都很感动。

有时候,侯老师到北京出差,回来时往往会带一些“杂包”给我们。就是到北京开人大代表会议,会议往往也备有一些较好的便于代表携带的小礼品供代表选购。侯老师也曾买过茶叶和印有“人民大会堂”的筷子送我们。

谢谢侯老师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13. 侯老师对时间抓得很紧,生怕耽误了工作,就是生病也不愿上医院。1996年,侯老师在学校查出肺部有病变。当时学校医院的院长李宁再三挽留,希望侯老师在学校住院输液治疗一段时间,侯老师就是不愿意。侯老师的儿子侯孝祖老师打电话叫我去劝侯老师,侯老师哪肯听我的劝告呢!李宁院长见不能说服侯老师,赶紧去拿了一些药,嘱咐侯老师一定要按时服药,注意休息。侯老师还是义无反顾地回长宁去了。后来听说侯老师在长宁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时任西农校长的向仲怀立即亲自去接侯老师回校,第二天就送西南医院住院,但还是未能使病情好转。几个月后侯老师就离我们而去了!

(责任编辑 肖 艳)

后记:著名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侯光炯院士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他治学严谨、敬业勤奋,一生为了土壤科学事业,为了人民群众,为了莘莘学子,鞠躬尽瘁,无私奉献。身体好的时候努力干,身体不好的时候,还打起精神拼命干。他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万世师表”。他的各种感人事迹,很多老师早已用各种方式有所叙述。我们写这些点滴回忆,目的在于再次表达我们对侯老的崇敬之心和怀念之情!



纵观刘又辛教授一生，唯在教育事业与文字训诂学。1945年，白之翰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离开云南之际写下“教育事业之神圣，学术思想之尊严，乃有所丽，而可久维而不敝”（《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维护尊严的学术思想，正是刘又辛教授一生的写照。

刘又辛，原名刘锡铭，字又新。山东省临清县人，生于1913年4月。其父旧制中学毕业，曾在抗战时期将家中仅有的三间正房捐出创办一所武训学校的分校。父亲毕生献于教育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此外，父亲作为他的启蒙老师，不但教授给他《孟子》、《论语》、《诗经》等四书五经，也让他读过“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等新学中的课文，使刘又辛旧学、新学都具有一定的功底。

初中毕业后，刘又辛得同学资助就读于北平市第一中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



刘又辛先生在西南大学文学院文献所庆祝其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主席台上(2002年4月)¹

罗常培、沈兼士、魏建功、唐兰、闻一多诸先生治语言文字学。

其时，日本正一步步蚕食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正念高中的刘又辛受到极大的震动，面临“国将不国”的局面，“读书人怎么办”成为他日夜思索的一大问题。在梦想拿起武器奔赴战场的道路被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堵死之后，刘又辛从师长学人，从元、明历史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即“读书救国论”。他认定：中国传统文化不灭，中国就不会灭亡。

1937年7月7日，在北大东斋做着“治学梦”的刘又辛被芦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他被迫休学，回到家乡。他先是悲观失望，认为生为亡国奴，不如死为自由鬼。后来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树敌太多，中国民心振奋，逐渐得出日本必败的结论。而且听说北大已经迁到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于是决心到昆明复学，重温治学旧梦。

1944年，经过一年半的艰难跋涉，刘又辛终于抵达昆明。完成学业时，正值抗战胜利。随后，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刘又辛受师长命留在昆明，入昆明师范学院担任中文系音韵学等课程的教学。就这样，刘又辛从此真正走上了教书、治学的道路。

解放后，刘又辛受昆明师范学院委托，前往重庆，一方面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询问昆明师范学院的归属问题；一方面看望病危的老师罗庸先生。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挽留，刘又辛留在了重庆工作，担任乡村建设教育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刘又辛来到西南师范大学任中文

¹⁻² 图片由刘又辛老师的家人提供。

系教授,直至去世。

怀着民族新生的兴奋感的刘又辛热情洋溢地投入工作。1955年,他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代表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和中国少数民族会议。1956年参加由高教部召集的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研讨会。其撰写的《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引起了语言学界的积极关注。当时,刘又辛还是四川省推广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那几年他废寝忘食、唯恐日短,备课,写讲义,研究汉字史,写文章,而“不知疲劳为何物”。

然而,1957年,在“扩大化”的“反右”运动中,刘又辛被无中生有地罗织了8大罪状,打成“右派”,直至1979年始得平反。22年的“右派”生涯,刘又辛从迷惑不解,徘徊不安,几欲了结自己的生命中逐渐走出,他运用语言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法”来透析人生,“后退是暂时的,而前进是必然的”。作为“恰逢其会”的个体,则应怀着“以不厌不倦者自敬其业,而业乃久;以不忧不感者自乐其道,而道乃尊”的精神,如此,学者方成其为真正的学者。于是,“在带着枷锁的跳舞中,我仍然认真研究,写出了《现代汉语论文语言的发展》一文的初稿,完成了一本关于习作的讲义。”在文革中“重新钻研中医,在批斗喘息之余竟做起了业余医生”(刘又辛《我与训诂学》)。

1979年,摘下右派帽子的刘又辛终于得到了从高中时便梦想的“一张平静的书桌”,又开始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弥补耽误的时间,他日夜兼程、老当益壮,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9名,出版《通假概说》、《训诂学新论》、《汉语汉字答问》、《刘又辛语言学论文集》等专著11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于2000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集一生心血的《汉字发展史纲要》,在语言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先后获重庆市政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二等奖,他提出的“汉字发展三阶段说”,正日益受到学界认同,并将改写我国长期以来把汉字发展分为甲骨文、篆书、隶书、行书、楷书的划分。刘又辛教授,成为学界公认的21世纪硕果仅存的训诂学大家。

老而弥坚的刘又辛教授1987年退休,但仍担任一门研究生课的教学,还计划要撰写《汉字发展史》、《汉语词族谱》、《论语选注》等书。有人劝他,都近90

岁了,还辛辛苦苦写那此东西干什么?刘又辛教授慨然说到:我在这里得到的快乐,决不是百万富翁以及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的人所能体会得到的。我常有一种负疚感,总感到自己的生活消费都来自人民,自



刘又辛先生在四川师范学院主持硕士研究生答辩会(1983)²

己所学到的一点知识,都来自前人,现在有幸恭逢盛世,看到国家的日益昌盛,只觉得自己做的事太少,实在有愧于我们可爱的祖国和人民。

从1997到2005年,即刘又辛教授85到92岁高龄期间,他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先后共发表《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谈谈汉语词源研究》、《顾野王玉篇引说文校补》等27篇学术论文,为一般年青学者所未及。尽管年事已高,但教授思维清晰,学术积淀丰厚,故其成果如汨汨流水,渊源不断。

“温故而不知新则为平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则是浅妄。已经存在的叫故,今天要做的叫新。个人作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中的小小的一节,理所应当为历史发展长河增添一滴水,使她流得更快、流得更好。”刘又辛教授侃侃而言,“如此而已”。

2006年1月,一场大病使刘又辛先生最终放下了一生耕耘不止的笔,但仍然不时和同行、学生谈论语言文字训诂和学术研究。2010年1月25日,刘又辛教授去世,享年97岁。

(本文选自《缙云山下一支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方卫国老师对文章进行了一些补充。)

(责任编辑 杨程程)

回忆我的父亲刘又辛先生

□文/刘 朴

一、难忘风雪夜

父亲出生在鲁西北平原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子里,因为离县城临清正好三十里,所以叫卅里铺。村的正东二里地是一个叫白佛寺的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村西二里地是吕堂,一个比卅里铺稍大的村子,我的爷爷就在这里教书,父亲和二叔则跟着爷爷在吕堂念书。那年父亲九岁,二叔七岁。冬天一个下午,天气突然发生变化,风吹雪下,我奶奶的娘家在吕堂,太姥姥见风大雪急,希望爷爷三人暂时住下,爷爷却不肯;太姥姥又要求把两个孩子留下,爷爷仍然不答应。就这样,放学以后,爷爷带着父亲和二叔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是多年不遇的暴风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膝盖,走路也变得十分艰难。冬天的黄昏很短暂,爷爷三人刚一出村,天就完全黑下来,雪又太深,根本分辨不出路在哪里。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走啊爬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里走了很久,距家不过二里的路程,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不单是看不见家门,连村子也找不着,爷爷意识到迷路了,但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领着父亲和二叔往前赶。也不知过了多久,隐隐地,爷爷看到一丝灯光,挣扎着走近,喊开了门……

这个故事是小时候奶奶讲给我听的。奶奶说:“你爷爷喊开了门,你猜是谁家?是你白佛寺的马大爷家。接着你马大爷提着灯笼,抱着你二叔,把他爷

爷送回来的,回到家时都过了喂牛时了……”喂牛时,是指晚上六点到八点喂牛的时间,过了喂牛时,也就是晚上八点以后。从五点到八点,爷爷他们在狂风暴雪中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从吕堂绕过卅里铺,竟到了白佛寺。

“他们冻坏了吧?”我问奶奶。

“没有。”奶奶说,“就是累坏了,贴身的衣服都汗湿了……”

“这么大的雪,为什么不住在姥姥家?”

“为了叫他们在路上背书呀!”

我也知道,爷爷要求父亲和叔叔诵记的东西太多,课文篇篇背,外加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还有各种对联等等。

“你爸和你叔,一年只有三十和初一没功课,可以玩两天……”

我有些明白了,正是因为从小就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所以当了一辈子军人的二叔在退休以后,仍能写出《实用大众周易》这本书,能将如此深奥的古籍解释得清晰、透彻,别具一格。

二、我的爷爷

爷爷刘养元是几十年的教书先生,在许多村都教过,并且特别照顾穷人家的孩子,不但不收取他们的任何费用,还送书,送石板和石笔。那时的学生,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完擦去再写,一块石板可以用许多年。对于家里特别穷的孩子,奶奶经常留他们吃

饭,送他们衣服。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回乡以后,总见一位栾姓二叔来看望爷爷奶奶,每年都来,每次都带好多东西。我问奶奶:“二叔是咱们家什么亲戚呀?怎么这么亲?”奶奶告诉我:“那时候,他父亲在咱们村给地主种地,他比你二叔小,跟你四叔差不多大,家里很穷,跟你爷爷念书,跟你叔在一块吃饭,他忘不了,就一直把咱们家当成他第二个家,现在日子过好了,也忘不了……”

教书之余,爷爷也给人看病,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中医,行医从不收费。按照农村的习俗,家里请先生来诊治病人,定要留先生吃顿丰盛的饭。爷爷为了不给病家增添负担,从来不留下吃饭。他一生中,生活极其简朴,土布衣衫,粗茶淡饭,俨然已形成一种家风,影响了后辈几代人。

最令我钦佩的是爷爷凛然的民族气节。1940年前后,日本侵占华北,我的家乡成了沦陷区,日本人在县城的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强迫中国学生学习日文课本,学习日语。城里武训小学的老师一致抵制,爷爷就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当教室,在我们家成立武训小学卅里铺分校,把武训小学的老师请来任教,在附近几个村招生。这在临清地方史志上有详细记载。去年,临清市政府把爷爷生活过的小院列为临清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院中竖了块石碑,上面刻着“临清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训小学卅里铺分校遗址”。这是对爷爷最好的褒奖和纪念。

三、去临清读书

当时的农村学校只有初小没有完小,因此父亲十一岁读完初小后,接着便去县城临清读完小,就读于县立第一小学校,学制两年;初中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即现在的临清市一中前身),学制三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有两个人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个是父亲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汪绍南,当时临清著名企业济美酱园老板的独子。父亲在临清读书的五年里,逐渐和汪绍南成为好友,节假日时常到汪家做客。

另一个是十一中学的校长张乾一先生。张先生

的学识和人品都很出众,堪称楷模。他身为十一中学的校长,还担任教学工作。他和父亲从相识、相知到成为忘年之交,一直到1986年去世,这期间始终和父亲保持着书信往来。

四、上北京

按照爷爷的设想,父亲初中毕业后应去聊城念师范学校,因为师范是公费,不用自己缴钱,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父亲念高中上大学,因为父亲还有三个弟弟也在读书。这时,汪绍南的父亲汪永椿老先生来到家里同爷爷商量,打算叫父亲陪他的儿子汪绍南去北京读高中,路费、学费、生活费由他承担,爷爷答应了。于是,父亲在十六岁时,和他的好友汪绍南一块上北京念高中、上大学。

汪绍南是个痴迷京剧的票友,经常带着父亲去看戏,久而久之,父亲也养成了对京剧艺术的热爱,这个爱好陪伴了父亲一生。

高中毕业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喜事,可也成了天大的难事。因为大学的费用比较高,而这些费用不可能由汪家全出,爷爷奶奶为了筹措父亲的学费,东拼西借,费尽波折。

五、辍学回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解散,父亲只能辍学回家。回家后,父亲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抗战剧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不久,家乡也被日本人占领,父亲又主办《力报》,继续宣传抗日。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涉猎了许多中医知识。因为爷爷是医生,家里自然少不了医学典籍,耳濡目染,父亲也学会了看病,并且逐渐对中医有了新的探索和体会。闲暇之余,他用毛笔抄写河北名医张锡纯的名著《衷中参西录》,订成十册,装成两部。这两部手抄书一直被爷爷珍藏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开始给人开处方看病,爷爷才将这两部书寄往重庆。书至今还摆在父亲的书架前,成为一个永恒的纪念。

六、二次求学之路

1942年冬,日伪的扫荡封锁日益频繁,这时父亲听到一个消息——北大、清华、南开几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召唤辍学的学生复课。父亲、二叔等人一同出发,从高唐到济南,又从济南到达安徽阜阳。二叔、二婶和四叔留在了阜阳,父亲只身辗转到西安,本想由此处去往昆明,可惜走到西安路费告罄。正巧,原十一中的校长张乾一先生为避战乱也来到西安,并在一所中学任校长。他安排父亲在一所师范学校担任一学期的语文教师,父亲借此挣了路费,又重新踏上去昆明的路。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父亲坐着拉货的敞篷车,经过几天的行程,还遭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车祸,幸亏有惊无险,终于抵达昆明,找到西南联大,实现了复课的愿望。

七、在昆明的日子

毕业后,父亲留在联大任助教,不久又转成讲师。之后日本战败投降,西南联大解散,各校纷纷北



1947年在昆明(左一为刘又辛先生)¹

迁,父亲又转到昆明师范学院(后来又改名云南师范学院,现在是云南师范大学)任教。

在昆明的那几年,有三件事要说:第一件事是在这期间父亲错过了一次去英国留学的机会,对此他很惋惜;第二件事是父亲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就把四叔从阜阳接到昆明,并安排二叔在昆明念高中,上大学;第三件事,当时是战乱时期,物资极为匮乏,食堂里只有米饭,父亲吃米饭就烧心,结果得了严重的胃病,这个病跟随了父亲一生。

八、只身到重庆

西南联大中文学院有两位姓罗的先生,即罗常培先生和罗庸先生。罗常培先生身材高大,学生们私下称他是大罗先生;罗庸先生身材较矮小,学生们私下称他小罗先生。两位罗先生都是父亲的恩师,与父亲有着极深的师生感情。

1948年罗庸先生离开昆明去重庆,可到重庆后不久就病了。罗庸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民主人士,在抗战前的白色恐怖时期,陆定一曾住在他家达半年之久,而这时刘邓大军已解放重庆,所以接管地方的军管会领导多次看望罗庸先生,询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罗庸先生提出想把我父亲从昆明接来。那时昆明和重庆刚解放,交通并不方便,于是父亲乘坐军管会的运输机从昆明抵达重庆。到重庆以后,父亲全身心地照顾罗先生和罗夫人,直到罗先生去世。

在这期间,父亲认识了军管会的姚大非,两人一见如故。姚邀请父亲留在重庆工作,感情难却,父亲就答应下来。父亲想回昆明搬家,姚不许,说:“刚解放,百业待兴,各地都在网罗人才,你去了昆明,绝对回不来。”父亲便把四季的衣物、被褥及书籍等等,全都抛在了昆明。不过在把罗庸先生安葬在缙云山以后,父亲仍然坚持把罗太师母(罗庸先生的夫人)送回北京安顿好,再回到重庆。

到北京以后,父亲去看望罗常培先生。那时罗先生担任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挽留父亲在语言研究所工作,只是父亲和姚承诺在先,只好婉拒恩师,

¹ 图片由刘又辛老师的家人提供。

只身回到重庆。

1951年,母亲、姐姐和我曾住在北京罗太师母家里半年多,这些事情都是罗太师母告诉我的。

九、意气风发

1950年开始,父亲协助姚大非接管改名为川东教育学院的重庆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担任川东教育学院的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西南师范学院成立,父亲一心一意从事教学,专注做学问,担任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汉语研究室主任、院工会副主席、院务委员会委员。除教学、搞学术研究外,父亲还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多次应邀到邻近的步兵学校(“五一”研究所的前身,和西南师范学院一墙之隔)讲文化课,在各校的青年讲座上进行讲演,内容是苏联的一些书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古利雅的道路》等等;也参加了许多大型学术会议,写过许多学术论文。

1954年,父亲在北京的老同学聚会商议,想把父亲调到北京,一来方便学术交流,二来也可弥补老朋友的思念之情。正巧当时的教育部长齐燕铭也是罗庸先生的学生,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教育部往西南师范学院发了六封调函,结果却如石沉大海。后来北京的马学良伯伯给父亲来信询问原因,父亲这才知道,于是拿着信去找姚大非伯伯(那时姚是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姚伯伯说:“是有调函,都被我压下了,这里的工作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帮帮我吧……”于是父亲再一次失去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

十、大难临头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父亲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划成右派,工资停发,全家人只发生活费,住房也从学校民主村小楼房搬进熊家院一处阴暗潮湿的房间。正如成千上万的冤假借案一样,无休无止的批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有一次杨欣安伯伯被迫参加批斗会,看到当时情景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却被视为同情右派,受到严厉训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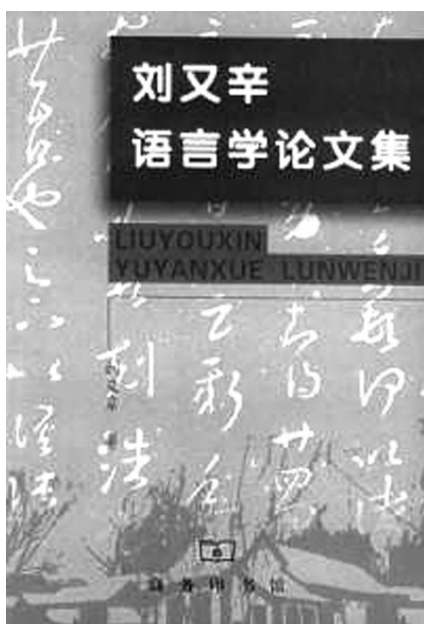
事隔五十几年后的今天,再回想那一段历史,似乎很清楚了。假如1950年父亲没来重庆,而是留在昆明教书,平平淡淡地生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会是什么结果?假如1954年父亲去了北京,在诸多老同学、老朋友的圈子里,谈课题,搞研究,又会是什么结果?造化弄人,父亲被划成三级右派分子,将被送往缙云山农场监督劳动。而就在父亲上山的前一天晚上十点以后,姚大非来到我家,站在屋子里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泪流满面,嘴里不停地说:“保重,千万保重……”此时的姚大非已被降为副书记,对父亲的悲惨遭遇亦无能为力。

十一、最艰难的岁月

1958年4月,父亲被下放到缙云山农场监督劳动。正值大跃进之际,全国上下就像开足马力的机器一样,超负荷运转。父亲体弱又有胃病,一生没参加过体力劳动,年过中旬以后突然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其艰难程度绝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有时候,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又接到通知去二十里外的煤矿去挑煤。高举的火把,崎岖的山路,压得红肿的肩膀,累弯的腰,沉重的步伐……等到千辛万苦地回到驻地时,已是黎明,新的一天,新的劳动又开始了……

如此艰难的劳动关,父亲毅然挺了过来;然而比劳动关更困难的却是生活关。上山之初,吃的东西虽然质量不高,但数量不限,劳动后人人可以吃饱饭。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伙食开始定量,参加劳动的人们经常吃不饱饭。幸亏母亲平时是个很节俭的人,总是把粮证上节余的粮食换成粮票存起来,而此时这粮票就派上了用场。父亲每月有两次回家的机会,每次住上一天,在家里吃一天的饱饭,走时再带上五斤炒熟的面粉,以缓解山上缺粮的困境。周围许多朋友知道这种情况后,纷纷主动把节余的粮票送给我们。

这样的情景持续半年有余,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困难越来越大。由于那时国家经济遇到危机,居民粮证上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副食奇缺,人人计粒而食。家里储存的粮票已经用完,朋友们也无力再支援我们,新的问题又出现在面前。姐姐在外念书,家里只剩下母亲、妹妹和我,粮证上的定量总数是58斤,



《刘又辛语言学论文集》封面

而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每月节省 10 斤粮食来支援父亲。但是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父亲知道,只说仍然是朋友“拼”的,只是现在较紧张,他们支援得少一些。于是父亲每次回来,一天的粮食是 9 两,走时再带上 3 斤半炒面。为此,我们实行了长达 10 个月的节食。母亲说,狼恶虎恶没有饥饿恶,饥饿的感觉有多折磨人,许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在最难熬的时候,我眼前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崎岖的山路,打着火把,重担压肿了肩膀,压弯了腰……

然而困难远不止于此,紧接着的是疾病一关。刚开始父亲患了水肿,又叫低蛋白水肿,脚胀得看不见踝骨,脸胀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接着又在劳动中扭伤腰。农场批准病假,父亲得以回家治病。每隔三天,我都要搀着父亲去重庆北碚区第九人民医院诊治,早上七点出发,踱着缓慢的步子,一步一挨,几步一停,八点半走到医院。而父亲在腰痛病好一点以后,又回到了农场。

十二、枯木逢春

1961 年秋季,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家中,但并没有恢复原来的职称,仍然是摘帽右派。而我在经历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后,特别想念家乡的爷爷、奶奶,于是在 1961 年的冬季离开父母,回到了山东临清老家。因此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我知之有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彼时他已步入老年,但仍然能做出惊人的成绩,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便不再多言。

最后,用父亲写的一首诗《老牛曲》作为结尾:

喜得春雨润园畦,无悔终生驾犁犁。

老牛未觉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

(责任编辑 王艳艳)

校史求证

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时学校的校名,左边是西南文教部部长楚图南题写的校名,在西南农学院筹备之初挂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大门的校牌用的就是这个字体,右边是郭沫若题写的,以后的“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的校名用的都是这个字体。可是,我们对校名题写的具体时间和经过却不得而知,所以,本期杂志向全校师生及各界校友求证:

这些校名是什么时候题写,题写的经过又是怎样的?

请知情者与我们联系。

电话:023-68252544

邮箱:xdjy2009@126.com

(责任编辑 张晓华)

西南
农
学
院

西南師範學院

西南師範學院



京剧是流传北京、河北、天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一种戏曲剧种,距今已有近 200 年历史。京剧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响亮的锣鼓点、优美的身段、栩栩如生的脸谱、美轮美奂的画面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的美的体验。如今,面对流行音乐的冲击,京剧虽然与大部分地方戏剧一样逐渐衰落,但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的“国粹”,京剧仍然是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大剧种。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学习京剧列入课外活动内容中,目的无外乎是为了提高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培养更多更年轻的京剧爱好者,使这一国之瑰宝在群众中扎根立足。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南农学院(简称西农,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85 年改名为西南农业大学)的京剧活动就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了。现仅就西农几十年的京剧活动作一个回顾与总结。

西农京剧活动的萌芽时期

1951 年,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1951 年的 4 月 3 号,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京戏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选择性的加以继承。同年,政务院发布了“改戏、改人、改制”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地

开展了一场“戏改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农的京剧活动开始萌芽了。1952-1956 年可算是西农京剧活动的萌芽阶段。

1950 年成立的西南农学院是西南地区第一所独立的、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经过 1952 年至 1953 年的院系调整,集中了西南地区大部分农科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师资和设备。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校园里涌现出一批京剧爱好者。当时的京剧爱好者,教职工中主要以易廷鑑、安新炽、秦少伟、钟登富、李友霖、朱桓、庄宝仁、甘斗南、孟振武、王鑫等人代表,学生中以土化系 56 级为主,主要有宋恩瀚、汤又新、汤宗祥、段炳源、陈德杰以及园艺系的卢开瑛等人。在这些京剧爱好者的积极推动下,西农的京剧活动逐渐开展起来。

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唱”指演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结合构成歌舞化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虽然有的演员擅长唱功(如生、旦),有的行当以做功武打为主(如花旦、武旦、武净等)。但是每一个演员都必须兼备唱、念、做、打四种基本功,才能更好地表现和刻画戏中的各种人物,充分发挥作为歌舞剧的戏曲艺术表演的功能。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无论是英姿飒爽的子午式,还是独特响亮的嗓音,都要经过无数遍的练习才能达到。共同的兴趣使这些

¹ 本文资料由宋恩瀚、庄宝仁、王拾敏、寇婉如、钟登富五位老师提供。

京剧爱好者经常聚在一起练习，在刻苦的练习中提高各自的表演水平。除了一起练习，他们还常常自发地举行一些坐唱活动，自娱自乐；也不时会在校广播中倾情演唱，还会参加学校的一些联欢节目，有时也到澄江镇荣军学校等地进行慰问演出。频繁的演出活动也使他们的京剧表演水平日益提升。

西农京剧活动的全盛时期

1954年，西农由下坝迁来天生桥新址，这无疑给京剧活动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1956—1958年间，西农又分配和调来了一些酷爱京剧艺术的教职工，其中包括有深厚老生功底的王拾敏，嗓音圆润、出身梨园世家、专攻旦角的寇婉如，富有文学才华的“鼓师”程绪徽，以及毕业后留校的“琴师”宋恩瀚等。他们被一些爱好京剧的教职工戏称为“四大台柱”。再加上舞台上的全才——既可唱老生，又可扮老旦、小生和丑角，缺什么补什么的庄宝仁老师。如此一来，西农京剧“班子”可谓是“生旦净丑具备、文武场面齐全”。此时的西农京剧“班底”空前壮大，加上当时西南农学院党委书记张一夫的积极支持，西农的京剧活动在新当选的工会正、副主席李友霖、甘斗南的主持下迅速发展起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剧目，极大地丰富了师生员工和附近群众的精神生活。1956—1958年堪称西农京剧的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西农的京剧活动不仅人才济济，演出的剧目也比较丰富，多达二十三场次，主要有《空城计》《女起解》《三堂会审》《甘露寺》《捉放曹》《宇宙锋》《打渔杀家》《上天台》《珠廉寨》《审头刺汤》《连升店》《打严嵩》《座寨》《二堂舍子》等剧目，其中《二堂舍子》还是由刘海旺副院长提供的新剧本；1957年春节还演出了全本的《龙凤呈祥》；1958年4月演出全本《四郎探母》。这些剧目主要由朱恒、钟登富、秦少伟、庄宝仁、寇婉如、孟振武、王拾敏、庄宝仁、余乐、安新炽、许鹏、甘斗南等京剧爱好者出演，演出的伴奏主要有：程绪徽的司鼓、宋恩瀚的京胡、西南师范学院来校进修的唐应桐老师的京二胡等。京剧爱好者们不仅经常在校内表演，还时常走出校门进行演出，如他们曾在西南师范学院演出《甘露寺》《打渔杀家》等剧目，在歇马场6905厂演出《女起解》等剧

目，在澄江敬老院演出《武家坡》等剧目，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

自1958年起，受极“左”思潮影响，一些老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他老师有的调离学校，有的年老多病甚至去世（如孟振武、易廷鑑）。虽然京剧爱好者中还有一些年轻尚在的教职工，但由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环境中，京剧舞台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被不分良莠地批判，导致大家都不敢再唱京剧。西农的京剧活动也逐渐变得萧条。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党中央提出，舞台不能都交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要展示革命题材以及工农大众、革命人民的现实生活。于是在江青的指导下，先后排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样板戏折子戏。这些样板戏京剧被统称为革命现代京剧。各地方剧团、文工团、京剧院只能根据“样板”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的出现，使京剧获得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普及。那个时候，大喇叭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在播送现代京剧。在西农，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现代京剧，音乐课教唱现代京剧，课间学唱现代京剧，各系还利用政治学习的时间教唱现代京剧，室内张贴的也是现代京剧的剧照。在狂风暴雨般的宣传阵势下，校园里上至老戏迷，下至几岁的小孩，几乎都会哼几段现代京剧。那个时期，连从不唱京戏的教职工和家属也都积极的参与到演唱和演出活动当中，西农京剧活动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当时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教职工下放住进我院，两校的京剧爱好者们经常在一起清唱娱乐，同台演出。另外，与我院紧邻的部队五一研究所初由外地迁来，计划排演《红灯记》，诚邀我院宋恩瀚去协助操琴。宋恩瀚受我院革委会政工组委派，与五一所一共合作演出了十五场《红灯记》全剧。演出结束后，五一所赠送宋恩瀚两枚毛主席像章和一座毛主席石膏塑像以表谢意，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最高奖赏了。除此之外，宋恩瀚还多次受派参加了北碚区慰问8711铁道部队的演出，同去的有弹月琴的陈则刚老师、还有拉京二胡的本院教师王拾敏之子王聪和向道骏老师之子向可。

校史校情

“文革”时期由我院教职工及其子女出演的京剧剧目主要有《沙家浜》选场、《红灯记》选场、《智取威虎山》中《定计》、《龙江颂》选场《外出支援》等等,另外,还演出了一些京剧清唱节目,除王拾敏、寇婉如、陈家凤等的清唱之外,还有各系各单位的男女声小合唱、对唱和独唱。如土化系湛正英、黄前美、王光慈、方天贞、青长乐、王国英、刘庆全、江育璋等演唱了《沙家浜》中的主要唱段《定要战胜顽敌度难关》,她们都是从未上过台的普通教师。由此可见当时京剧普及之广。除在本校演出,京剧爱好者们还参加了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举办的重庆大专院校汇演。本次我院



1990年4月29日,在北北仪表总厂礼堂演出《断臂说书》,冷厚宁老师饰陆文龙²

演出的剧目系院长办公室主任、“编剧才子”程绪徽创作的独幕京剧《专场演出》,由陈家凤、寇婉如、王拾敏、庄宝仁等主演,群众演员有刘灼均、杨庆熙、袁正雄、王成志、邓万魁等。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我院很大一部分教职工正在参加襄渝铁路的修建工作,一些唱功很好的教师未能参加全部演出。

西农京剧活动的复兴时期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一时唱遍西农每个角落的革命现代京剧也随之退出舞台。同时由于“文革”的冲击,岁月沧桑,很多老先生已无兴致再唱京剧,只限于在小范围内吊吊嗓子而已。比较幸运的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传统京剧的解禁和对现代京剧的重新肯定,在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李国诚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西农京剧演出活动又开始蓬勃开展起来。尤其是1990年元旦,江泽民总书记把京剧抬升到国粹的高度,提出振兴京剧的响亮口号。随着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的京剧活动在全国的开展,我校的京剧活动掀起了第三次高潮。

这一阶段我校京剧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学校与社

会相结合:请进校、走出院;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相结合,并吸收部分学生参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振兴京剧艺术、弘扬国粹、活跃校园生活、提高西农知名度做出了贡献。此时冷厚宁老师也调来我校,花旦、青衣、小生、丑角,他样样表演自如,甚至还可以敲打几下锣鼓,被王拾敏戏称为“戏包袱”。他的到来,为学校的京剧活动增色不少。

这一时期我校京剧活动频繁,校内外的演出活动接连不断。校内的演出活动主要有:

1990年元旦,在土化系党总支书记傅显兰同志的倡议下,土化系党政工团邀请以王拾敏为团长的北碚业余京剧团,为我校师生员工进行一场新年慰问演出。这次演出配备了录音、录像、投影字幕等较先进的音像设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演出剧目有:《苏武牧羊》《女起解》《坐宫》《贵妃醉酒》等。

1991年3月9日,在本校校办主任申请宁的支持下,由成人教育学院王有超、曹盛德院长赞助,土化系主持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演出”。演出剧目有:《陆炳审头》《黛玉葬花》《霸王别姬》等。

此外,还有西农校庆晚会、45周年校庆、老年节演出活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等等,这些活动中演出

² 图片由冷厚宁老师提供。

了《光辉照儿永向前》《智斗》《状元媒》及曲牌《柳青娘》转《海青歌》等剧目。

这一时期,校外演出也特别频繁,主要有:

1989年3月在重庆政协礼堂参加“重庆京剧爱好者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清唱活动;1989年9月参加北碚区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演出剧目为《空城计》;1990年1月13日,参加北碚川仪总厂春节慰问离退休老同志演出;1990年春在重庆文化宫参加“峡口杯京剧大奖赛”,演出《苏武牧羊》《女起解》《坐宫》等剧目;1990年4月,参加北碚川仪一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演出,演出《断臂说书》《姚期》《贵妃醉酒》等剧目;1991年1月,在重庆人民剧场演出《姚期》《三堂会审》等剧目;1995年10月,在北碚文化馆参加“天生街道庆祝重阳节文艺联谊汇演”,演出《沙家浜》中《智斗》片段;1997年10月,在北碚区辅导站庆祝重阳节汇演中演出《状元媒》。

此外,王拾敏老师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参加演出并多次获奖,并与市京剧团多次合作演出,还与来访的香港戏友同台演出,也曾代表重庆戏友参加北京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获特别奖;寇婉如老师也多次在重庆、绵阳等地演唱,并与校外合作演唱钢琴伴奏《红灯记》,还受西南师大老协的邀请数次参加京剧演唱,大受欢迎;冷厚宁老师也多次在重庆、成都等地参加演出。

展望未来,后继有人

回顾西农京剧活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毫不夸张地说,该项活动是我校坚持时间最久、最有成效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之一。她不仅是京剧爱好者们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使得京剧艺术在全校的师生员工中广泛传播,她更是使独存于我国的世界四大剧种之一——京剧也得到了发展与弘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曾活跃在西农京剧舞台上的京剧爱好者如程绪徽、邓永康、杨梓臻、冷厚宁业已去世,而马莉娜已离开学校留居国外。目前寇



1999年11月9日,演出《二进宫》,王拾敏老师饰杨波³

婉如、王拾敏、庄宝仁、陈家凤、宋恩瀚等虽唱、艺仍精,学校离退休处和工会的领导们也非常支持,但毕竟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西农京剧的舞台上极需补充有活力的青年一代。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中、青年教职工已参加到京剧活动中来。例如在我校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演出中亮相的杨明英医生,她的老旦戏嗓音高亢洒脱、有滋有味;在我校中青年卡拉OK大赛中凭《智取武虎山》唱段而获一等奖的青年电工祁绍全等。这些都是西农今后京剧活动的主要骨干。京剧除了要有演唱的角色外,还离不了乐器伴奏,在我校教授计算机的向可老师,从小习练京胡,有扎实的基础,是京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乐手。

虽然可能还有一些喜欢京剧的青年教职工,由于工作繁忙,至今未加入到京剧活动当中。但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两校的合并⁴及京剧艺术的不断传播,新一代京剧活动定会在21世纪的西大校园内绽放出新的灿烂之花。

(责任编辑 杨程程)

³ 图片由王拾敏老师提供。

⁴ 2005年7月,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一、乡建院的“四自精神”及“四自教育”

位于重庆北碚歇马场大磨滩（当时校地属巴县管辖）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院），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学府。乡建院原名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创始人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晏阳初等人就开始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并于 1923 年正式成立平教会，在全国各地推行识字运动，1927 年后又专心致力于农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1939 年初，由于日寇的步步紧逼，平教会办事处不得不迁到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四川重庆，并在迁入后积极创造条件，继续开展平民教育的研究实验。当时晏阳初先生担任最高国防参政会参政员，负责四川和湖南两省的后方建设。他认为后方的建设主要是乡村的建设，而乡村建设是一个包括人的教育在内的系统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培养志愿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人

才，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乡村建设，这是平教会多年的宿愿。

本着为中国的乡村建设，特别是战后农村的复兴培养人才的目的，晏阳初于 1939 年 3 月开始着手筹办育才院。为便于学生耳濡目染地从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去认识问题，院址选在了巴县歇马场大磨滩附近的乡村。经过一年多的辛苦筹备，教育部终于在 1940 年 7 月准予备案，将其定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晏阳初任院长，院长之下设院务主任一人，辅助校长处理院务，并按教育部规定，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育才院开办之初，设乡村教育和农业



壮观的大磨滩瀑布

两个专修科,目的是培养县级单位乡村建设的行政和技术人才,招生对象为高中(中专)毕业后有一到两年工作经验者。1945年8月,有关当局批准育才院扩建为独立学院,改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批准该院向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乡建院环境优美,四周群山环抱,院前龙凤溪水回绕,附近更有壮观的大磨滩瀑布(又名高坑岩瀑布)和层峦叠翠的狮子山,一派自然风光,没有一点人工雕琢的痕迹,学校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更重要的是,晏阳初先生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别具一格。出于为中国的乡村建设,特别是战后农村的复兴培养人才的目的,晏阳初先生提出“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智能”、“教育者的态度”、“创造者的气魄”、“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精神”等六大具体教育目标,要求学生具有“自立、自养、自治、自强”的“四自精神”。

为培养学生的“四自精神”,在课程的设置上,学院以教育部颁布的标准为基础,结合社会的实际需要来进行安排;在科系课程的设置、学生实习和毕业生的安排方面,推行“即学即用、服务社会、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方针,还提出“研习教学模式”即研究与实验实习相结合,在璧山县设立华西实验区,突出“即讲即学,即习即能”的一贯式教学特色;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提出“自习、自给、自强、自治”的“四自教育”,“自习”是培养学习能力,“自给”是培养生产能力,“自强”是培养健康力,“自治”是培养组织力。为使“四自教育”贯彻落实,学院从组织领导机构、教育内容和课堂内外的教育活动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一套相应的措施,成立学生“四自会”就是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

二、独特的学生“四自会”

学生“四自会”是乡建院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学生组织,负责主持学生的一切课外活动并对生活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院务会的得力助手。乡建院的行政机构很小,全院的工作人员屈指可数,主要办理一些日常事务。由于院长晏阳初先生长期在国外讲学、募捐,四处奔走,一年只回国一两次,整个学院的工作便委托教务长主

持。教务长既抓研究与行政工作,自己也上台讲课;重大问题由各系主任、教授和学生代表集体讨论决定;在学生的管理方面,则主张学生自治。

解放以前,教育界一些开明人士也主张学生自治,一般大、中学校都有学生自治会,但不少学校的自治会实际上是有名无实。那时,大学一般设训导长,中学设训育主任,其中很多人都是监视和统治学生的政客,而乡建院的学生“四自会”却是名符其实的学生自治的组织。由于乡建院收生标准严格,学费极低,考进的学生大多家境清寒,但素质较好,有较强的自制能力和组织能力,所以学院领导也放心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教育部规定学院设训导处,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工作,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的控制。由于晏阳初先生拒绝在育才院建立和发展任何党派组织,所以训导处只是处理一些学生生活管理方面的问题。到了1947年,乡建院取消训导处,改由各系教员组成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与导师和学生“四自会”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

乡建院学生“四自会”成立于1946年。在此之前,学院对学生的管理采取编队的形式,各科学生以年级为单位,每级组织一分队,各分队组成一中队,设中队长一人,由训导处指派学生生活管理主任兼任。各分队队员分成自习、自治、自强、自给四组,每组的正副组长组织本队队员开展活动。分队长和各组正副组长都由学生推选,任期两个月,不得连任,以便更多的同学都能得到锻炼。学生组织及活动的情况,另行评分。此外,学生还可根据个人爱好自由结合,组织研究会、读书会之类的社团。

1946年,晏阳初先生向师生重申“四自教育”方针,提出成立全院学生“四自会”。在晏阳初先生的倡导下,全院学生选举产生了学生“四自会”。“四自会”由监委会和执委会组成。根据平教会的四大教育理论,“四自会”主席之下设自习、自给、自强、自治四组,故名“四自会”。

为充分发扬民主,“四自会”干部的选举采取严格的程序:先由各系、班级选出代表组成班代表大会,班代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四自会”章程,并负责主持“四自会”主席的选举工作;然后班代会用民主方式提出“四自会”主席候选人名单,各候选人分别组

校史校情

织竞选团开展竞选活动;最后全院学生投票产生“四自会”主席,并由主席聘请四个组的组长成立“四自会”执委会,以对全院学生的课外活动及生活秩序等进行多方面的有效管理。“四自会”所有成员,一学期改选一次,形成制度,直到解放前。

民主产生的“四自会”在学生中威信甚高,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的“四自会”干部,在学生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们都是同学的公仆,全心全意为学院和同学服务,不求任何报酬;不称职者,可随时罢免,重新补选。这些干部在协助学院和为学生服务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才干。

从1946年下学期起,每届竞选结果基本上都是进步力量掌握了“四自会”的领导权,每届“四自会”主席也大都由地下党员或地下社员担任。在党的领导下,“四自会”在同学中威信更高,一呼百应,工作做得尤其出色。从1946年9月至1950年4月先后担任“四自会”主要职务的学生如下:班代表会召集人:杨化宇、刘抚力、蒋年荣、刘泽光、张嘉航;监委主席:吕兰、王家荣、万继金、令狐荣礼;执委会主席:甘光余、周文耕、李庆恩、涂矩斌、杨睦九、陶维全、罗人俊、廖文凡。

在成立“四自会”的同时,学院还成立了由各系教授代表组成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下设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生活辅导委员会与导师和学生“四自会”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广大学生一面按照学院领导的安排成立学生“四自会”组织,另一方面一些志趣相投的学生自由结合成立社团,各系有学会,毕业班有级会,还有个人自由结合组成的读书会、壁报社、研究会等。

此外,学院还专门设有女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女生进行管理。女同学除参加全院“四自会”组织外,还可加入女生院女生生活励进会,该会下设学术组、康乐组、总务组、妇女工作组等,主席和各组组长也是每学期一选。女生生活励进会是学院倡导的学生组织,可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工作,也需服从学生“四自会”的统一部署。

三、丰富多彩的活动

学院充分利用学生自主的课外时间,正确恰当地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和社会研究,激发学生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学生“自强、自习、自治、自给”的能力。由全院学生普选产生的“四自会”,是一个有着相当大自主权的实体,承担着学院大量的工作:协助学院维护教学秩序,管理校舍,处理日常事务;组织学术讲座,召开各种学术、时事、专题讨论会、报告会;举办论文、讲演、歌咏、球类比赛;组织同学生产自给,改善生活,办好食堂,协助院务会的工作等等。

学生“四自会”的活动,是“四自教育”方针的生



人间剧社”在校内和儿童福利院上演“升官图”剧照¹

¹ 此图片由重庆市北碚区文广新局提供。

动体现。自习组主要负责召开各种学术、时事、专题讨论会和报告会,并主办《院声》、《乡建通讯》等壁报和期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自给组主要负责各项生产工作的办理,还负责辅食部、洗衣部、成衣部、理发室等特约部门的管理,培养学生的生产能力;自治组负责维持各种集会秩序,管理各种杂项事务,调解同学间的纠纷,组织工友读书班等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自强组负责管理环境清洁,放映电影,扩大合唱团,举行各种小型竞赛,充实医药室,举办球类比赛及各种晚会等,主要培养学生的健康力。

为更好地贯彻四自教育方针,学校办有农场、影音施教队、工友夜校、子弟小学(景慧小学)等基地供学生实习,“四自会”也组织同学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开展生产自给的活动,以搞好和改善生活。学院划出部分土地分配给各系、班种菜,自主经营,以此改善生活。为解决部分家境贫寒的同学的上学问题,学院设有助学金、奖学金,还为贫困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另外,“四自会”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团结下,积极开展一些进步活动。乡建院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当时各个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都要设立政训处,而晏阳初先生为了保护这块“民主自由园地”,坚决抵制在学院设立政训处,也不允许在学院成立党派组织,但实际上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一直存在,并积极活动。从“四自会”成立开始,党组织始终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有些“四自会”干部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者后来被发展为党员,如“四自会”主席周文耕(树楹)、甘光余、陶维全等都是干练的地下党员;几个组的正、副组长,也多数地下党员与地下社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团结下,“四自会”及其领导者大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风等贯彻执行,并把广大师生员工团结在党的周围。乡建院的

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在重庆历次的学生运动中,他们总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是重庆学生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

抗战胜利后,全国掀起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乡建学院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学生“四自会”这一合法组织的领导和众多进步社团活动的配合,号召全院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学院内的少数特务进行斗争。在斗争中进步力量日益强大并形成压倒优势,反动力量日益被孤立。在1947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及“六·一”事件和1949年的“四·二一”运动等全市性的学生运动中,乡建学院学生每一次都站在斗争前列。在这些运动中和运动后,地下党发展了六一社、新青社、民青社、野草社等进步社团组织。因此乡建院的进步势力扩大,进步活动受到的阻挠少,学生们将学院称之为“沙漠绿洲”、“民主堡垒”、“小解放区”。

乡建院的主要负责人晏阳初等主张把学院办成民主自由的园地。因此,在乡建院“四自会”的各项工作中,“自强、自习、自治、自给”的“四自精神”始终贯穿于学生的全部课外活动之中,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时也使学生受到了民主精神的教育。教职员中有不少知名民主人士,积极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抓起。同学之间也很团结,互相帮助,融洽相处,让人感到这是一个亲切、友爱、温暖的集体。学院形成了勤奋朴实、团结友爱,民主气氛浓厚的校风。这所地处乡间的学校,规模虽小,但声誉日盛,为青年学生所仰望。

(责任编辑 王艳艳)



根植村社在大地上写文章

□文/林元吉¹

编者按：农业是立国之本。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始终把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发展农业科技放在首位来抓。要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要实现粮食生产现代化，还包括了要实现经济作物和多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很多科学家为此毕生耕耘在相关领域里，默默无私奉献。我校的林元吉教授正是这样的人，将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蚕桑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用心血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推动蚕桑业发展的新路。



在石柱宇城坝农林示范基地专家办公室²

我自1959年，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蚕桑系毕业留校

任教以来，就一直从事高等农业教育科研、生产工作。从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我总结出经验：“低产靠体力、中产靠肥力、高产优质靠智力”，因此，我坚持遵循高校农科的特点，坚持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深入农村基层农户、企业生产基地，结合农业生产实际，把蚕桑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造福于广大农民实现增收。虽然1997年就已退休，但是我始终心系西南地区的农业，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和蚕丝产业，退而不休，发挥所长，用心血和汗水走出

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推动蚕桑业发展的新路。

我深知“三农”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民

¹ 林元吉，四川南充市人，原西南农业大学教授。1959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后留校任教至退休，曾任蚕桑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重庆市蚕学会常务理事、中央电视台科学顾问等职。1997退休后仍一如既往地辛勤耕耘，为发展农村经济、推动蚕桑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好评。《重庆日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先后作了专访报道。

² 本文所有图片由林元吉教授提供。

生是国家之本。重庆市是最大的直辖市,农村广阔,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农村经济、惠及民生是符合国家政策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作为一个农业大学的教师,我以服务三农为已任,充分展示出自身的专业特长和人生价值,为提升蚕丝产业综合生产能力而努力。我坚信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不仅囿于高楼课堂和实验室,更要扎根于农村广阔的土地、立足于农业生产基地,服务于农业发展、服务于农民,致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将一己之力倾注到国家农业科技发展的伟大事业当中。

从1986年开始,15年来我积极响应党中央科技兴农、科技扶贫的号召,跨出学府,把课堂搬到农村大地,为蚕丝产业发展尽心竭力。我时常出入于云贵高原,走进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穿梭在巴山渝水间,足迹遍及四川万源、三台、达县、凉山州、重庆云阳、铜梁、巫溪、黔江、石柱、忠县、云南的永德、临沧、贵州的遵义、黄平、广西的河池、宜州、柳州、南宁等100多个县市。在农村蚕桑生产基地与蚕农牵手合作,尊重蚕农的意愿,引导蚕农瞄准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桑蚕品种配置、推广与普及省力养蚕等先进实用技术、建设现代蚕丝产业,尤其是在向农民传授先进技术、培养新型农民、创新蚕业发展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提出的桑(蚕)——草(兔、鸡、畜)——桑枝(菇)——蚕沙、兔、鸡粪(沼气)——沼液、菌棒肥还地(菜粮)的高效生态蚕业模式,对桑园里鸡蚕套养、发展循环农业、扩大市场内需消费、提高蚕业综合生产能力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劳力紧缺的困难,我还大力推广桑蚕优良新品种以及先进适用的省力实用型养蚕技术,将栽桑养蚕技术与服务送到桑地蚕房,为蚕农实际解决技术难点和问题,为现代化蚕业的发展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科技兴农、科技扶贫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深入村社考察调研

1986年,作为西南农业大学首批科技扶贫人员,我拿着竹棒,翻山越岭,第一次来到四川大巴山腹地的万源县临河乡和巴中革命根据地的农村作实地考察。后来我又先后四次来到大巴山,制定了发展蚕



在石柱指导蚕农科学采蚕

桑产业,振兴万源、巴中等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划,还深入村社、培训蚕农8000人次,现场示范指导蚕农栽植良桑品种1000余万株,共增加经济效益3500万元,打破了高海拔山区不能栽桑养蚕的说法。

1998年,刚退休不久的我应黔江政府的邀请,沿着乌江、阿蓬江流域对彭水、黔江等地蚕桑生产进行调研,并在全区召开的蚕桑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明确指出:全区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大,空气流通,宜桑宜蚕,蚕茧产量高,质量好,是重庆生产和出口优质蚕丝的宝地。同时提出黔江的蚕业生产要更快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科技进步和提高茧丝质量,集中部分农户使养蚕成为他们的主业,形成一定数量的专业户,基地乡、基地村实现产业化的生产。在我的努力下,这些地方采取了技术指导、培训蚕农、改善养蚕设施等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以养蚕消毒防病为中心,“小蚕共育、大蚕省力”的六化五配套的先进技术。2011年,黔江地区的蚕茧产量由1998年的1800担增到60000担,蚕农年收茧款近1亿元以上,黔江地区已成为重庆蚕业的一颗明珠。

把讲台搬到农村

1989—1991年,我参加了四川省科委下达的“丘陵地区农业技术综合开发”项目,进入三台县15个

校史校情

乡镇,为2000多农户举办了不同层次的蚕桑技术培训班80次,并多次到桑地给蚕农现场操作示范,不仅带动农民新栽成片密植桑树3540亩、新建改造蚕房9300间,改善了养蚕环境条件,而且提高了蚕农科技养蚕的水平,实现了全县年养蚕30万张种、产茧14万担,三年累计蚕茧新增产值达7230万元。在此期间,1990年,我还承担了“重庆潼南县农业支柱产业蚕桑优质高产技术开发”的任务。由夏到冬,我在潼南古溪镇和县城,面向村支书以上的四级干部和蚕农1000多人,以“我国蚕业发展趋势及潼南蚕业生产发展路向”为题作了专题演讲,极大地激发了全县干部和农民栽桑养蚕、振兴农村经济的热情。同时,我还同县局的领导、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以逢场咨询、短期培训、专题讨论、现场示范等方式把栽桑养蚕的先进技术送到村社农户,三年间共培训蚕农5万多人次。

1992-1999年期间,我经常奔赴四川攀西安宁河流域的德昌、宁南、会东、会理、普格、米易、盐边、攀枝花等彝胞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扶贫,多数时间都是乘硬座或无座火车往返于重庆与凉山州之间,坚持义务传授科技养蚕技术,引导农民发展蚕桑生产。

2000年盛夏,铜梁县委、县府史太平、廖松波、包先进等领导来校聘我和吴大洋等教授为蚕桑生产技术顾问,进行县校科技合作。我们先后到了围龙、安溪、二坪、少云、虎峰、全德等33个乡镇进行栽桑养蚕技术讲座80多次,培训蚕农5万人次,为当地奠定了技术人才基础。

2003年,石柱县人民政府与西南农业大学签订了县校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建设合作协议,决定把发



在石柱三星乡雷庄村宣讲蚕桑生产技术

展蚕桑产业列入县校合作六大产业之一。作为“晚霞专家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我在石柱县大规模推行西农6071、农桑12号、14号、湘7920、桐乡青等优良品种,先后举办了25期培训班,受训人员5000人次,发放资料6000余份,极大地提高了蚕农的养蚕水平。

2006-2009年受重庆市人大和西南大学的委派,我先后10次前往忠县三汇、官坝、白石、永丰、汝溪等镇乡村社举行了12次栽桑养蚕技术培训班,培训蚕农、干部科技人员5000余人次。我不仅向蚕农传授先进的栽桑养蚕技术,阐述蚕业前景,平时还到蚕农家中进行技术指导,提高了养蚕水平。蚕茧年产量由2005年的4000担提升到15000担,蚕农收入1275万元。三汇镇的党委余成荣书记对校地合作处陈运康处长说:“林教授今年来我镇作了4次精彩的科技演讲。今年又遭特大干旱、水稻、红苕、蔬菜都晒死了,基本无收。全靠西大林教授技术指导,唤起了蚕农养蚕热情,全镇养蚕1800张,蚕农茧款净增200万元。西南大学师生还为我镇捐赠10万元,修好了5个水库。解决了生产生活用水问题。”三汇镇人民政府还给我送了“教授爱民深似海,科技讲座进山来;字字珠玑讲技术,誓推蚕农上高台。”的感谢赠词。

急蚕农之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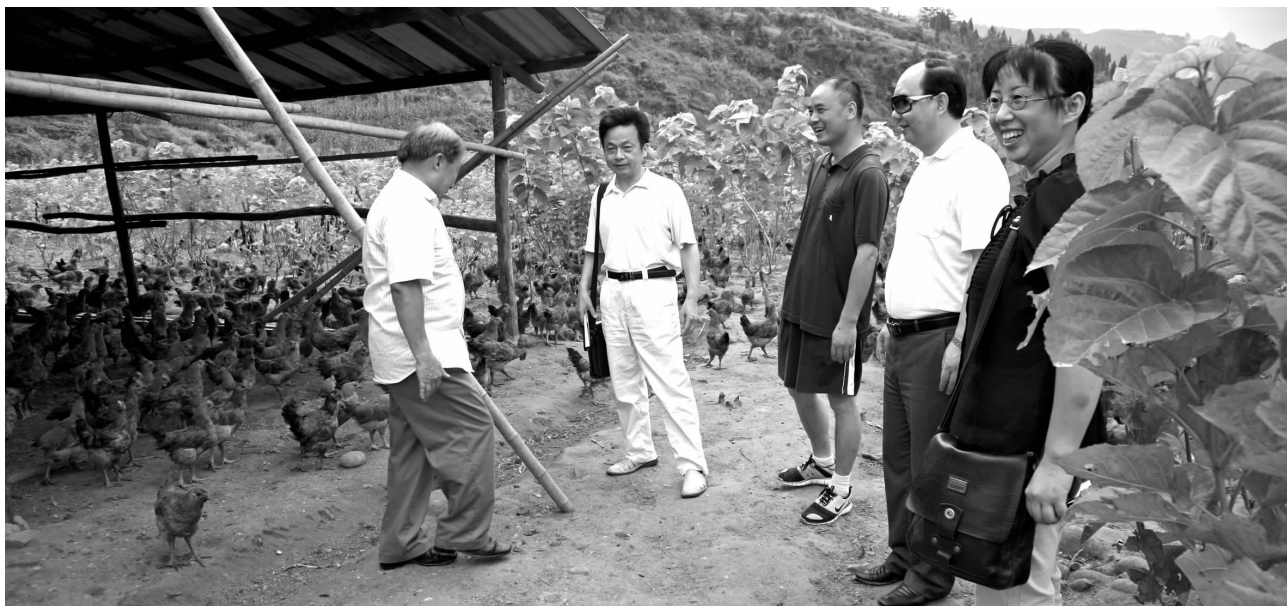
我始终关心农村桑蚕的发展,一心把蚕农的切身利益放在重要位置。1992年,我承担了农业部、云阳县三峡库区移民农业科技开发项目中的“优质蚕茧”工程任务,给当地蚕区引进优良桑树品种实钻11-6、湘7920穗条20多斤。鉴于春节临近,天气转暖,怕桑穗条发芽嫁接效果差,于是大年初一全家团聚后,初二早晨六时我就背着桑条转车三次来到朝天门码头,已是9点多钟,所有班船都开走了,我只得又转乘两次公交车到了渝北长途客车站,可开往云阳的班车在春节期间停运了,等了两个小时终于上了一辆赴梁平县的私人中巴车,抵达梁平时已是万家灯火,又等了一小时才搭上了货车,到万县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这时我已相当疲倦,就在轮船码头附近一家私人旅馆住宿。第二天凌晨6时我又

背上桑条到开往云阳的车站,得知过年班车停开了,只好乘上短途公共汽车到了白杨镇,这时又下起了雨雪。我将桑穗条放在一家食店背风的屋檐下保护起来,然后站在外面等班车。大约等了2小时后,从万县方向开来了一辆面包车,我急忙走去向司机请求说:“我是重庆西南农业大学的教师,为了不误农时急需送良桑穗新条新品种到云阳农村进行嫁接,请支持搭个车,照常付车票钱。”司机微笑着风趣地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过年都在出差,我的车不走云阳而是到水磨乡。”“那请能否顺便把我搭到前面院庄乡?”司机笑着说:“好嘛,快上车”。我给他15元钱,司机拒收说,这是公车我不收你们的钱。午后两点我在云阳院庄乡下了车。这里地处高山地带,行人稀少,风雪更大,我背上穗条步行了3公里,终于把一半桑穗条送到蚕农李光兴家。他激动的说:“我是看到一个人从坡上走下来,以为是背着火药枪打猎的,走近一看原来是林教授背着良种桑穗条。您真不简单,我们春节前后正在进行嫁接赶上了,谢谢您”。附近的蚕农纷纷前来拜年祝福,请吃年夜饭。因还要将剩下的桑穗条送到长江对岸的村社,我在蚕农家吃了一碗汤元后,又搭上蚕农的摩托车上公路,再转乘汽车到云阳蚕丝公司。这时天已黑完了,在值班室的同志热情支持关照之下,第二天我迅速把另一部份穗条送到长虹、黄石镇农户家中进行嫁接。这一行动感动了李玉堂县委书记和广大农民群众。

“小蚕靠火养,大蚕在风里养”,养好小蚕八成收。为了蚕农的丰收,2000年5月6日凌晨我从北碚乘长途车,来到铜梁全德镇飞凤村,在小蚕共育室里就蚕农饲养小蚕注意加温补湿、稀蚕鲜桑饱食等关键技术进行指导,蚕农、村干部非常感谢,再三留我吃午饭,我故意说镇上已作了生活安排而推谢了,在返回的路上竹林里,用自带的面包和开水代替了午餐后,转乘三次车回到了学校。事后镇上的领导和职工知道这一情况非常感动的说:“林教授五一节放长假都不休息,来我们村指导蚕农养蚕,饭都不吃悄悄走了,他真是蚕农的贴心人。”

为蚕农排忧解难

1994年夏季,德昌县茨达乡彝族区域,50多户蚕农养的蚕发育到1-2眠时,生长缓慢,蚕体发黄体躯肿大,生长发育不齐。蚕农十分着急,有20多名蚕农前往德昌县政府告状说:县蚕业办发的蚕种有问题,是劣种,要求赔偿。蚕办的负责人说:“蚕种没问题,是蚕农养蚕技术处理不当引起的。”双方矛盾十分尖锐,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巧我已来到德昌,立即与蚕业办的领导、科技人员、蚕农前往现场观察蚕的症状,初步确定是中毒引起的。蚕农不理解,说:“养蚕未使用农药,是蚕种质量不好,要求赔偿损失。”于是我们又去走访农户,仔细调研,终于发现了蚕中毒



王小佳校长在石柱考察桑园养鸡养蚕

的原因,是在部分养蚕户的门前、院坝推放了从高山采下的剧毒野果,晒干后医药公司收购作药用,农户在翻晒毒果时剧毒的药味挥发,风吹到蚕房引起蚕的神经中毒所致。于是及时组织蚕农打开养蚕室的门窗通风透气,用茶水、甘草水喷洒在桑叶解毒,蚕渐渐正常起来,大部分的蚕都结了茧、减少了蚕农的损失,消除了蚕农与政府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三下乡”成为常下乡

2001年2月,我受重庆市科委委派,参加重庆市“三下乡”第一分团,到万盛区全桥乡送文化、科技,给500多名蚕农科技人员讲授栽桑养蚕技术,受到蚕农好评。该乡的领导和农民再三向市科委主任张文团长请求,把林教授多留几天给我们村社蚕农深入交流科学养蚕技术。张团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很乐意地接受了群众的邀请。当时细雨不断,区科委要派轿车要送我到村社,我担心山路坡陡路滑损坏车,就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了。我与乡干部、技术人员三人步行20多华里来到了范家村,站在搭起塑料蓬的院坝里,顶着寒风为300多名蚕农详细的讲授了养好蚕的关键技术,午饭后,又冒着雨,返回乡镇住宿在居民家里。第二天雨下得更大了,我拿着路棒又出现在该乡的中心村,为200多名蚕农传授栽桑养蚕技术。万盛区委姜平书记得知这一情景非常感动,接见了我对他表示感谢!

2002年1月8日,我再次受市科委科技分团的邀请,来到荣昌县龙镇开展三下乡活动。当一位姑娘表示转向发展养蚕生产时,就告诉她一套完整的快速育苗的方法,既省钱又省时,随后将自己的名片送给了她,并表示今后作她的科技顾问,使她对发展这个产业充满了信心。她告诉记者,回家后就着手准备养蚕。

2002年3月13日,四川省阆中市委、市政府聘我为蚕桑科技顾问。我深入村社传授技术15场次,遍及8个区47个乡镇,直接听课的7000人。我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归纳成条条点点讲授,受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喜欢。3月24日,市长邓火平在思依镇听了我的演讲后感动的说:“农业必须产业化、产业化

一定要靠科技,我们请来林教授就是为全市农民请来了‘蚕财神’。”“今年全市发8万张种,若按林教授传授的先进实用的技术饲养、单张蚕种增产5公斤,将增产40万公斤鲜茧,全市将净增500万元”。羊鹿村的蚕农听课后为桑树补施了12吨春肥;飞凤镇党委政府重新修订了发展目标,派人到蚕桑局再次购桑种子10斤,增加育苗100亩;金垭镇书记、镇长重新规划业主大户;金子乡党委政府把授课录音摄像在黄金时间反复播放,蚕农育苗栽桑情绪高涨,三天内育完了300亩桑苗。阆中市原计划育苗5000亩,现已突破了8000亩。

2002年元月17日,我受市科协的邀请,到梁平县虎城镇参加“三下乡”送科技活动,以“适用科技养蚕”为题给400多名蚕农和领导演讲,我的演讲不时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演讲结束后,镇党委邓平寿书记热情的握着我的手激动的说:“林教授啊!今天你的讲课非常精彩,很适用,你比歌星、影星还受欢迎。你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起码又使全镇今年蚕农多增收50万元”。

2002年元月至2003年4月,我被聘为重庆市农村妇女拜师学技专家组组长,先后在璧山县的璧城镇,沙坪坝的凤凰镇、虎溪镇,江北区的五宝镇,给600多名妇女做了题为“乘我国入世机遇,农村必须发展特色优势蚕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专题讲座,讲完后还到现场指导她们修建蚕房、进行桑树冬春技术管理,示范嫁接技术。每次下乡活动结束后,市妇联领导都要用专车送我返校,而我却再三谢绝,坚持乘公交车回到学校。

激励学生深入农村

2002年6月,我受校团委的邀请,给全校100多个暑期学生“三下乡”小分队负责人和200多名骨干,介绍自己长期在农村科技兴农、扶贫的感想,教导青年大学生如何面对农民兄弟,传播农业生产和养蚕的实用技术,内容具体风趣,会场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演讲完毕后,许多同学向我索要签名和名片,有的还邀请我参加小分队的指导。

2002年7月,我受学校团委邀请,担任了近40人的西农博士团和暑期智力三下乡小分队的技术指



激励学生深入农村

导,前往合川市官渡镇进行科技赶场活动。我与学生们一起站在高温阳光下,不论是10个人还是1个人,都耐心地讲解和咨询,先后给400多位农民传播了农业生产、栽桑养蚕等农业科学技术,深受群众的欢迎。第二天早晨,我谢绝了镇领导包专车送我们下村社的好意,带领同学往返步行30多华里,来到梭子村的院坝里,面对100多名蚕农,就蚕子为什么要生病、如何实施省力养蚕提高劳动效率等实际问题,采取问答和归纳讲授的方式,蚕农们听得津津有味。会后蒋定平镇长激动的说:“西农师生不怕天热为我们传授养蚕技术,官渡镇今年养蚕可能要多收100万元”。第三天师生回到县城又在塔耳门广场,不顾天气炎热,给100人解答科技难题。重庆市、合川市政府领导还亲自来现场慰问我们!

2003年10月,我受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委派参加了“三个代表”进村社专家演讲团,担任第四分团团长,先后在长寿、涪陵、丰都、石柱、忠县等五个县区的村社,面向农民和基层干部开展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和农业科学技术、法律、税费、改革发展等社会理论知识的演讲及座谈,答疑解惑,又结合农村农民生产和生活实际,就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难点、疑点问题开展座谈、咨询,受到市委的表彰。

创新蚕业发展模式

石柱县栽桑养蚕历史悠久,气候良好,是生产优质蚕茧最适宜的地区。蚕丝业是石柱农村脱贫致富的一项优势产业。

2003年11月,在西南农业大学与重庆石柱县政府研究三峡库区石柱科技综合示范基地方案的会议上,我明确指出:中国丝绸至今仍是我国唯一能垄断国际市场的产品。栽桑养蚕是石柱农村一项珍、稀、特的优势产业,对农民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石柱县党、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把发展蚕桑生产列入县校合作六大产业之一,以资源循环利用和能量转化规律为依据,结合石柱蚕桑产业的实际,提出了桑(蚕)——草(兔畜)——桑枝(菇)——蚕沙、兔粪(沼气)——沼液、菌棒(肥)——还田(菜粮)的高效生态蚕业发展模式,并以临溪前进村、马武镇下拦坝、三河乡的宇城坝为高效生态蚕业示范基地。多年来,我常出入石柱各乡镇的高山谷地、院坝田间与领导、科技人员、蚕农牵手合作进行科技兴农、科技扶贫。每年一到蚕期我都要来到临溪镇,赶场天就搭起讲台,面对蚕农进行技术咨询,传授栽桑养蚕防病治虫技术;非赶场天就深入到该镇的前进村、花厅村、旭光村等农户的桑地、蚕房进行技术指导,这大大提高了蚕农养蚕业的科技水平。为了使高效生态蚕业落到实处,我总是冒着寒风,顶着酷暑,行走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走遍了石柱的重点蚕桑生产基地。每到一处我首先就是与当地蚕农干部在院坝里围坐烤火或在竹林里交流,了解蚕农在养蚕生产上最大的技术难题是什么,然后在树枝上挂起栽桑养蚕挂图,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当场给予解答。临溪镇原党委谭风生书记高兴地说:“我们背靠西南大学教授专家作科技支撑,突出发展蚕桑、长毛兔、辣椒等优势产业,农民获得了好的收成。”该镇年养蚕3200张,产茧85.5吨,蚕农收入200万元;桑地行间种黑麦草养长毛兔,15万只,出售兔毛24吨,收入288万元。



黄蓉生书记在石柱考察县校合作

校史校情

当前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农业劳动力十分紧缺。我便指导蚕农大力推行简易大棚省力养蚕，用竹子已搭建起室外简易省力养蚕大棚 420 个，实现了大蚕饲养不端蚕箔，不除蚕沙，省时又省工，原来一个劳动力只能养 1.5 张蚕，现在可养 3-4 张蚕，极大地缓解了农村养蚕劳动力紧缺的压力。而且大棚养蚕透风透气，蚕病少，蚕茧产量提高 30% 以上，非常受蚕农欢迎。此外，在金融危机中，广大桑农还在桑林下养殖了 10 万只土鸡，获得极大成功，纯收入达 50 万元，就地解决了 70 多个的个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石柱临溪镇实施的高效生态蚕业模式，正延伸至马武镇的下拦坝、三河乡的宇城坝、大歇乡的黄山村、南宾镇的灯盏村、桥头乡的野鹤村、龙沙镇的永丰村、三星乡的雷庄村等地。如马武镇下拦坝原是一铺满卵石的河滩，现已栽桑树 300 亩，在河堤上建起了养蚕房 40 间，组装了生态种养配套技术，走上工厂化、集约化生产的道路，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了蚕业综合生产力，现年养蚕 235 张，产茧 7.85 吨，蚕农收入 30 万元，桑枝生产香菇收入 15 万元，家家建起沼气池，解决了农户生活、养猪的能源问题，清洁了村庄、家园。又如三河乡宇城坝河床 320 亩的荒滩已披上绿装变成桑海，这里远看是桑园，近看是蚕棚，茧丝闪银光，成了石柱县重要的生态蚕业示范基地，实现了年产茧 1 万公斤，生产蚕种 5 万张以上，两项年收入 350 万元。

石柱高效生态蚕业的实施，蚕丝产业呈现两增长两提高的局面。2003 年，石柱县全县养蚕 11000 张，产茧 6100 多担，蚕农收入 390 万元，到 2010 年蚕茧产量 10400 担，蚕农收入 858 万元，年上缴财税 60 万元。而且蚕茧质量排在重庆前列。2006 年，在石柱县 15 公里以外的南宾镇宇城坝，投资 30 万元新建的标准化小蚕共育室、钢架养蚕省力大棚、培训教室、宿舍等各种生产，教学基础设施已正式投入使用。到 2010 年 4 月，南宾镇的蚕桑产业基地被列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农林试点实践基地建设之一，是石柱县或重庆市镇乡村社蚕桑生产、教学规模最大、配套设施

较为完善的工厂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生态蚕业示范教学实践基地。这一基地每年生产蚕种 50000 余张，除了供应本县各乡镇蚕养蚕用种外，还支援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农村养蚕需要，扩大了石柱蚕业的影响。

拨亮一盏灯，照一大片，石柱高效生态蚕业模式已扩展到黔江、铜梁、合川、永川等地实施推广。正如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学斯考察石柱农业生产座谈会上说：西南大学林教授在石柱推行的高效生态蚕业模式，不仅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一个亮点。

多流一滴汗，干部和群众捧出一颗心。我的事迹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石柱电视台、铜梁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重庆日报、老同志生活、西南大学校报等媒体对我的事迹先后进行了报导，我还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服务工作者，重庆市市委市人民政府扶贫先进个人、重庆市“三下乡”先进工作者、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等称号。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生命不息，奋进不止。为了“三农”事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甘为马前卒，愿为孺子牛。我将继续走出学府，与广大农民、干部、科技工作者牵手合作科技兴农、科技扶贫，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奉献一片赤诚之心，尽一份绵薄之力。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来石柱鸡蚕养殖场视察

编者按：他是大巴山的儿子，一腔热血，为民为党，澎湃激昂，恰如七十多年前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先辈们那样；他是共产党员，一颗红心，情系于民，忠诚于党，信念如刚，一生磊落宽厚正如巍巍的大巴山那样；他是组工干部，坚持原则，兢兢业业，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以行动得人民群众赞誉，凭公信树组织工作品牌。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短暂人生谱生命壮歌，人民公仆，感天动地。他就是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优秀校友李林森同志。李林森同志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本期的校友天地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缅怀他，学习他，以期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他的精神……

热血忠诚 丹心向阳

——记达州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林森

□文/孙玉侠



李林森¹

2011年7月31日，年仅42岁的中共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林森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辞

世。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立即对此作出重要批示：“李林森同志是一位公正廉明、无私奉献，愿为党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的基层组织部长。”号召大家学习李林森同志的先进事迹，认真学习李林森同志的四心，即责任心、公正心、关爱心、淡泊心。

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组织部部长，李林森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为党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他为什么能这样做？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能产生李林森这样的英模？他缘何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搏击云天的参天大树

李林森的家，就在巴山深处的宣汉。父亲李德明是一名教师，曾被评为四川省百佳校长，他与善良、勤劳的妻子高功丽言传身教，教育李林森“要做一个有用的人”。1991年9月，李林森从西南师范大学

¹ 2008年李林森在科技协会工作，<http://www.dzxw.net/wanyuan/news/20090225/50454.html>。

² 李林森(1969.09—2011.07)，男，四川宣汉县人。曾任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毕业。与很多大学生不同,李林森并没有留在繁华都市,而是返乡回到宣汉县教师进修学校,当了一名老师。那时的进修学校被一些老师当成是“养老的地方”。但是李林森努力工作,积极入党。在1994年,宣汉县检察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检察官。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检察院,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初到检察院,他被安排在政工科,这里工作任务多、福利待遇相对较差,但他毫无怨言,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1998年,一个消息让宣汉检察院里的“实力派”们兴奋不已——检察院将结合学习孔繁森精神,举办该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双向选择、竞争上岗活动。

“我的名字也带一个森字,我与孔繁森特别有缘。森字寓意深刻,那就是不做温室里的弱苗,要做搏击云天的参天大树;不做孤立无援的独木,要做形成屏障的森林。”李林森出色的演讲表现博得喝彩,扎实的工作成绩令人信服。当时的一个细节是,公诉科副科长的位置,有七个人竞争,李林森最终全票当选。也就是说,六位竞争对手也投了他的票,他的能力和人品所得到的公认,可见一斑。

在检察院工作的四年零八个月里,李林森公正廉洁,秉公执法,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正当李林森在检察院工作得心应手的时候,他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申请下派去当村官!

一名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检察院的副科长,却要下到贫困山村当村支书,这样的决定让朋友同事想不通。但是李林森自己觉得,学了知识出来,就要听党组织的安排,正如成熟的稻谷永远低垂于大地,他明白,一名干部的成长,离不开基层的历练洗礼。于是,李林森毅然下乡当起了村官。上任五宝镇梨耳村不到一个月,他就走遍了全村287户住户。“东林是个窝,出门就爬坡”,这句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东林乡的地貌,然而,李林森硬是用两条腿丈量完12个村,96个社,跑得勤的时候,耐穿的黄布解放胶鞋,他一个月要穿坏好几双。就是凭着这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对每一个村社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而正是在基层的摸爬滚打过程中,李林森清楚地听到了基层的呼声,知道了老百姓的需求,建立起了与基层群众的深厚情谊。他也在其中找到了工作的落脚点,掌

握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不能关起门来搞党建。老百姓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老百姓怨什么,我们就改什么。”李林森这样说。其父李德明认为,李林森之所以能够推出“四评村官”的创新举措,即来源于此。

四评村官

李林森任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五个月后,万源市委组织部接到了达州市委组织部下达的村党组织换届试点任务。曾经在三个乡镇担任过乡镇长或书记的李林森,工作法宝之一就是走群众路线。万源山高路险,下一次乡近的要走一天,远的三五天回不来。李林森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万源市大大小小52个乡镇,哪儿的干部叫啥姓啥,有什么长处缺点,他都清清楚楚。

在这个基础上,他重点选了八个不同层次的村进行深入调研,了解群众对选任村干部的想法和期盼。他说:“百姓需要的才是最合适的。”老百姓的声音一下子打开了闸。“自己的当家人只有自己选才选得准……”这是李林森听到的最强烈的意愿。他对组织部的同志说:“我当过村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选好了,可以造福一方,如果选不好,会贻误一方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党的形象,是大事啊!”李林森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一个想法:在村级组织换届中扩大选人视野,让老百姓在村干部选任中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四评村官”模式诞生,即通过“自我荐评”,用开放的方式选人识人,给每个想干事的人机会;通过“群众相评”,让群众提出村干部标准,推荐自己满意人选;通过“组织考评”,对推荐人选进行测试,让群众深度了解人选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公开竞评”,“赛场识马”,挑选出群众满意的村干部后备人选。

往川坝村罗天应老汉和全村144名年满18岁以上的村民,庄重而自主地投下了自己的一票。往川坝村曾经非常贫穷落后,交通差、饮水难、产业弱,村民们串门常常要“打泥巴”,一身上下都是泥。“前任村支书一直没有帮我们把实际困难给解决好。这次,我把票投给了潘毅。他是我们村的,知根知底。当过大学生村官,知识多、见得多,相信他能解决好问题。”——22岁的回乡大学生潘毅,在这次“四评村官”中,被全村党员群众推举为往川坝村党支部书记

记。他记得那天,组织部长李林森一直都在现场,见证了整个选举过程。他紧紧握着潘毅的手:“祝贺你,潘书记!一定不要辜负群众的期望!”年轻的潘毅,不愧是“四评村官”选出的带头人,上任半年,就带领全村人修通了17公里的联村路和社通路,建了三座石拱桥,彻底解决了往川坝村老百姓多年来最大的困难——出行难。

“四评村官”让万源市农村基层党组织换了气象,呈现出新模样。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36岁,比上届低了19岁;文化程度大幅提高,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61人,占41%。第二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对“四评村官”的经验做法作出批示并要求在全国推广。

组织部,一部渡人的梯子

紫溪乡位于川、陕、渝三省交界处,是有名的高寒山乡,被称为“万源的小西藏”。每年10月大雪封山,要到第二年4月才开始融化。不通公路的时候,镇上打电话都要到相邻的陕西省镇巴县去打。很多到这里工作的干部不是主动辞职,就是想尽办法往城里或条件较好的乡镇调。王承兴不言不语,在这个大山里一待就是15年。

2009年,大雪快封山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王承兴在乡政府见到了李林森。“穿件发白的蓝上衣,没有随行,只有一个司机,见面就笑,看不出是个领导。”王承兴至今仍记忆犹新。山里天气寒冷,李林森和王承兴围着炉子吃饭,李林森不停地询问着紫溪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状况和眼下的工作,聊了足足3个小时。这是王承兴10多年来和一个领导最长的一次交谈。只是,自己工作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提,压根也没想到提。

2009年农历腊月初四,很多熟识的人给王承兴发短信说他调动了。“我以为他们开玩笑,对我个人,进城是梦想,打死我也不相信。”原来,在万源干部中,曾经有个印象,调到边远山区乡镇工作,几乎像“打入冷宫”,就只能等着到老退休回家了。可就是这个在边远山区不言不语工作了10多年的王承兴,真的调动了,被任命为万源森林公安局局长。

促成这一调动的是李林森。王承兴的调动,在万

源市乡镇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乡镇干部见了他说:“过去都说,在乡上工作,好坏一个样,也进不了城,没得干头、没得盼头。把你一看,我们有奔头了!”

王承兴的调动,是李林森关于组织工作理念的一次实践。他在万源干部调任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重”标准:“重品行、重实绩、重基层、重公认”,特别是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推进重点工作中考察识别干部。

他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小人”。当面恭维他的,提着礼、揣着包来要官的,背后诋毁他人的,这些人都在他不能容忍之列。正是这种“不容忍”,成就了万源干部队伍的清风正气,使得每一个干部都知道,劲该往哪里用。有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工作能力强,一直想得到提拔。为此,他多次借向李林森汇报工作的机会送钱送物,每一次都受到李林森的严厉拒绝和批评。其实,李林森对这位干部的能力十分清楚,知人善任,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是李林森一直的主张。就在这位干部感到前途渺茫时,他被任命为另一乡的乡长。他吃惊、震惊。在新的岗位上,他工作出色,所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当年年底比上年净增789元。他感慨万分:“遇到了好领导,给了我做人做事做官的榜样!懂得了一个干部只要心正,踏踏实实干,就会得到组织认可,受到群众尊重!”

老百姓,他心中最深的爱

2004年9月,持续暴雨造成四川省宣汉县天台乡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滑坡堵塞了整个河床,位于河上游的五宝镇数万群众被洪水围困。时任五宝镇党委书记的李林森火速组织起应急分队,组织群众转移。傍晚,又饥又渴,与李林森同行的人拿出几包随身带的方便面,大家啃起来。这时,一个老乡路过,随口说了句:“李书记,你们吃饭了,我们的晚饭还没得着落呢!”李林森一下子呆住了,“扑通”一声跪在这位老乡面前,眼含泪水,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位乡亲惊住了,慌得不知所措,“李书记,玩笑……玩笑呢……”

老乡不知道,他的一句“玩笑”,正扎在了李林森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李林森出生在宣汉县红岭乡,他称自己是“山里



2008年4月9日,李林森给万源市官渡镇胡家坝村的留守儿童送去了学习读物³。

娃”。1991年,他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和检察院工作后,便扎进乡村,从一个村支部书记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他对土地和农民有着真挚的情感,对基层干部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爱,这种情感和爱浸染进了他的工作。每一个来到万源市委组织部基层干部或来访的村民都会受到李林森真情接待。他总是不停地端茶倒水,走的时候一直送到楼梯口。下基层调研,李林森从不带记者,他嘱咐组织部电教中心的同志要把镜头多对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碰到有困难的人,李林森就会伸手相助。

有一年冬,在白沙镇往川坝村,他得知贫困村民邓正怀家里40多只羊被冻死,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520元钱,让村支书转送给他。他资助穷困女学生熊静从初中读上大学,直至其毕业参加工作。蜂桶乡有个叫李国元的老人,是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担



李林森在万源市青花镇看望慰问农村老党员⁴

任蜂桶乡乡长、村支部书记。后来老伴去世,儿子在外打工,他一个人住在一处用木板搭的破烂不堪的老房里。2010年11月,李林森在下乡调研中见到了李国元老人,他走进老人四面透风的房屋,摸摸单薄潮湿的被褥,眼泪直往下流,紧紧握着老人的手:“老人家,对不起,让您受苦了!我这个组织部长没有当好。”他询问随行的同志给老人建房屋需要多少钱后,决定从市委组织部拿出15000元,余下的资金由镇里筹集,为老人盖新房。临走,李林森将自己身上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老人。如今,81岁的李国元已经住进了新房。令他心痛的是,他后来才知道李林森到他家时已身患绝症。

“救险书记”

2004年9月5日,持续特大暴雨洪灾导致宣汉县天台乡义和村突发特大山体滑坡,位于前河上游的五宝镇数万群众面临着被洪水围困的险境。

“共产党员,请跟我上!”灾情发生后,时任五宝镇党委书记的李林森火速组织9个应急分队,分赴8个村、1个居委会,冒着生命危险紧急转移群众。“一个也不能伤亡!”黑暗中,他坐着木筏,借着手电筒的微弱光亮,穿行在一片汪洋的村子之间,挨家挨户搜救。80多岁的老人覃宗秀一直记得李林森趟着过膝的水,背着她,手牵着她的孙女,把她们从自家的顶楼上转移到安全地带。经过10多个小时的搜救,两万多名受灾群众安全转移,无一伤亡。此时五宝镇已成了一座孤岛,外面的援助进不来,两万多人失去家园,所有生活物资全被洪水浸泡,交通中断、信息中断、电力中断……除了一身衣服,许多群众什么都没有了。在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面前,李林森沉着应对,昼夜奋战。“不能让一个村民饿倒、冻倒!”李林森不停地奔波、联络……9次把穿在自己脚上的鞋给受灾村民穿上,村里给他找来一双,转眼间他又光着脚回来。由于长时间劳累,他心力交瘁,体力严重透支。9月21日上午,在去物资发放点的路上,他两眼发黑,一头栽了下去。好半天,他醒来,一只手打

³ 2008 巴山的好领导李林森, <http://roll.sohu.com/20110928/n320838819.shtml>。

⁴ 图片来源,西安视野国内新闻, <http://www.xianhu8.com/xasy/gnxw/2011/0922/8735.html>。

李林森在救灾现场⁵

着吊针,一只手拿出手机询问情况、安排工作。一个副县长看在眼里,心疼得受不了,一把夺下了他的手机。“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呀!我躺下了,老百姓怎么办?”李林森就像战场上的士兵被夺走武器一样,泪水夺眶而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灾后的五宝镇,活跃着一支支马帮队,那是李林森在公路中断、重建物资无法运抵的情况下,动员全镇养马群众组建起来的运输队伍,他们用马背托起重建的重任。灾后不到四个月,一幢幢灾民新居拔地而起。如今,在高梯、回龙等村的石壁、墙壁上,仍随处可见“共产党好”、“天给我们灾难,党给我们温暖”等群众自发写下的标语。群众心目中的“救命书记”李林森,被表彰为“四川省抗洪抢险先进个人”,他的先进事迹在全省巡回宣讲。

一年零九个月

“对不起,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实在难以坚守岗位,请求辞去组织部长职务……”2011年4月20日中午,万源市委书记王成军收到李林森发来的短信。8天之后,重庆大坪医院发出李林森病危通知:李林森不仅患有肝癌,还同时患有肺癌,都是晚期……直到这一刻,与李林森朝夕相处的同事、亲朋好友才得知他隐瞒绝症病情已经一年零九个月。

2009年7月,李林森为万源市“七·一”表彰大会连续熬夜工作多日后,感觉异常疲劳,且伴有严重腹泻,吃药输液都不见好转,前往成都医院检查,诊断结果:肝癌晚期。

李林森几乎懵了,他只有40岁,怎么可能?!他和妻子相拥痛哭……

抹去眼泪,他沉思了很久,对妻子说:“我最放不下的是三件事,一是父母健康,特别是身患肝硬化多年的父亲;二是儿子读书;三是工作。”为此,他决定“不对外说出病情、不给组织添麻烦、不让父母受痛苦”,生病消息在亲友、司机等极小范围内戛然而止。

李林森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又向妻弟、妹妹借钱凑齐了首次手术费,在妻子和妹夫的陪同下,悄悄地去北京301医院做了肝脏移植手术。术后,他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说:“如果手术成功,有充分的休息,可以活5到10年。”他笑了:“好啊,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

回到万源,他对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做了一个“胆管结石手术”。

他工作上依旧不改“拼命”本色,审签文件、组织会议、接访群众、下乡调研……一件不落。只有在中午或晚上,他才会独自一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医院输液。他的手背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血管萎缩,无法扎针,医生只得在他手臂上埋了静脉置留针。再后来,他的身体出现肝移植手术后的强烈排异反应,手指、脚趾开始溃烂开裂,拿东西走路钻心的疼,他就大把大把地吃药。司机张从义回忆,每一次下乡,李林森的药都要用饭盒才能装下,好多次看到他大把吃药时,药卡在喉咙,吞不下去,半天缓不过气来,电话一响,他又谈起工作。这期间,李林森先后做过4次手术,多次化疗,每一次入院的时间都尽量选在双休日。2010年去北京的第二次手术,他把时间定在了12月28日,原因很简单,元旦要放3天假,他利用放假去做手术,4号就可以回单位正常上班。

2011年4月12日,李林森已不能坚持在办公室上班,他把部各办公室负责人召集到他在万源的住处,研究组织工作与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问题,从早上8点半一直开到下午近两点才结束。5个多小时,他专心地听,不断地说,不停地咳嗽,咳出的血,他小心地用纸巾捏住,不让大家看到。中午12点,他轻声对母亲说:“妈妈,帮我削个梨子,我要补充点能量,实在撑不住了……”

⁵ 图片来源,焦点访谈,巴山的组织部长:<http://roll.sohu.com/20110928/n320838819.shtml>。



李林森在病房⁶

2011年4月20日下午，李林森最后一次离开万源去重庆住院。车子驶出城边不远的青花镇，他让停住，缓缓下车，回头朝万源的方向久久凝望，一旁的司机看得清楚，泪水不停地从他眼睛里落下……

铁骨柔肠

病中的李林森，常常捧着手机里儿子的照片，无声流泪。儿子李东阳正在读高二，他不让通知儿子来看他，他每天给儿子发去短信：“我身体渐好，勿挂念，学习当努力！”他对家人说，希望自己走在7月，好让那时正在放假的儿子心理上有个缓冲期，开学时不影响学业。

他给父母发去短信：“爸爸妈妈，生命仅是个过程，我们都要看开些，当无法改变时，我们只有坚强面对。”

他对朋友同事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都要去的。我们缘深分浅，下辈子再相见！”

他对妻子说：“后事简单点，就回老家去，那里有山，有水，向着阳光，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他还有多少对家人说不出的话。这辈子，他的家人们没有一个沾过他当组织部长的光，父亲当了大半辈子民办教师，前年在一次“集体转正”中成为红岭乡小学一名公办教师；一个妹子至今还在老家县城汽车站做临时工；妻子家的两个堂弟曾希望他帮忙在政府里安排个事，没有如愿，如今都在外打工。回想这

些，李林森不觉愧疚，他说过：“我这个组织部长不是给个人当的，是给党当的，是给老百姓当的！”

他常说，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上的，但他要笑着离开。对工作和百姓，他已没有太多遗憾；对妻儿和父母，那无限的牵挂和愧疚也已凝成眼角最后一滴水。

2011年7月31日，李林森走了。42岁的年华，定格成最绚烂的燃烧。

后记：

李林森，走了。四十二个春夏秋冬，风尘仆仆，他走得那般匆忙。兴许是累了，他终于得到了永远的安息。李林森，走了。然而，他的精神，长存；他在无数人心底激起的涟漪，长存。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位新时代的人民公仆呢？

达州市委书记焦伟侠认为，是生长环境的历练，铸就了李林森的精神底色；是多种岗位的锻造，托起了李林森的精神支撑；是组工文化的熏陶，升华了李林森的精神世界。熟悉李林森的同事认为，李林森的成长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鼓点，和着组织培养的节拍，浸润在党性教育之中。他的出现，既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人事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结出的硕果。然而，又岂止李林森呢，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杨邦武，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文建明，永远的“巴山红叶”王瑛……巴蜀大地之上，还有一大批如李林森那般品德高尚、实绩突出的干部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涌现。又岂止在巴蜀大地呢，安徽凤阳“第一书记”沈浩，云南保山“草鞋书记”杨善洲，邯郸丛台区组织部长王彦生，……放眼全国，华夏大地之上，这样忠诚、爱民的好干部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英雄从未离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伟大的时代必将造就更多李林森式的党员干部，带领我们不断前行！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进程中，西南大学，必将培养出更多的李林森们！

(责任编辑 钟良鸣)

⁶ 图片来源：大巴山里的好部长，<http://roll.sohu.com/20110928/n320838819.shtml>。

校园里的京剧爱好者

□文/牟乔雅

编者按：上世纪50年代，西南农学院涌现出了一批京剧爱好者，共同的爱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求知之余，充分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和艺术才能，自娱自乐，乐己乐人。在那个文艺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他们的活动大大地丰富了师生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1952至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后的西南农学院，开始涌现出了一批京剧爱好者，大家经常举行一些坐唱，不时在校广播中演唱，参加学校举行的一些联欢活动。当时西农京剧“班子”可谓生旦净丑齐备，有扮演老生的王拾敏、专工旦角的寇婉如，有“鼓师”程绪徽和“琴师”宋恩瀚，他们被教职工戏称为“四大台柱”。他们那细腻、传神的表演，那高贵、古典的装扮和那清新优雅、韵味醇厚的声音无不彰显着国粹的魅力。



20世纪50年代寇婉如和宋恩瀚在排练



1957年寇婉如在西农大礼堂演唱《宇宙锋》扮演赵艳容



1957年王拾敏演唱《龙凤呈祥》扮演乔玄



1958年在西农大礼堂演出《四郎探母》全本,王拾敏扮演杨四郎,寇婉如扮演铁镜公主

文革时期,京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受到大力批判,大家就不敢再唱京剧了。“文革”结束以后,京剧艺术迎来了新的一页。尤其是江泽民书记在1990年提出了振兴京剧的口号后,西农的京剧活动再次掀起了高潮,除原有的一批京剧爱好者外,又涌现出了杨明英、祈绍全、向可等京剧爱好者,同时一部分学生也加入到京剧活动中。



马莉娜演出《凤还巢》全本



1990年《女起解》,寇婉如饰苏三,冷厚宁饰崇公道



1991年在北碚区委小礼堂演出《廉锦枫》,冷厚宁老师饰廉锦枫



1995年北碚文化馆演出《沙家浜》选段——智斗片段，寇婉如、王拾敏、许鹏演唱



1989年11月29日参加重庆京剧团纪念双百方针纪念演出，《群英会借东风》，王拾敏饰鲁肃及孔明



1999年国庆演出《红灯记》，王拾敏饰李玉和，寇婉如饰李铁梅

随着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逐渐丰富,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当年京剧演出的盛况再难寻觅,而当年西南农学院京剧爱好者们戏里戏外的故事,至今仍为大家津津乐道。



琴师宋恩瀚对京胡、京二胡的演奏技艺娴熟,双目失明后依然登台伴奏,只是换琴的时候常需有人协助。一次演出中,一位叫小李子的女同志好意坐在宋恩瀚旁边,协助宋老师换琴。那天演出正紧张进行,宋恩瀚示意小李子该换琴了,小李子却忘了宋恩瀚眼睛看不见,把琴倒着递给了宋恩瀚,并且弓子上的马尾还挂在了琴的“千斤”上。宋恩瀚愣了一下,马上发现了问题,急中生智扯断了几根挂在“千斤”上的马尾,把琴一顺,右手长弓短弓,左手换把揉弦,与前台的演出配合得天衣无缝,倒是把出糗的小李子惊出了一身冷汗。图为西农成立45周年演出《智斗》时的乐队,宋恩瀚(右一)等伴奏。

一次演传统剧目《坐宫》,由马莉娜老师扮演公主,吕嘉同学扮演宫女。当公主叫一声“丫头”,打坐向前啦!”时,按照剧情,此时扮演宫女的吕嘉应抱着公主的小孩(一个布娃娃)过来,先将小孩交给公主,然后去搬椅子,没想到“宫女”吕嘉一时手足无措,竟然忘了“孩子”该放哪里,情急之下,将“孩子”放在了桌子上,再去搬椅子,引起观众哄堂大笑! 图为20世纪90年代演出《坐宫》马莉娜(扮演公主)庄宝仁(扮演杨四郎)吕嘉扮演宫女。



京剧活动是西农坚持得最久、最有成效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之一。它为活跃校园的文化艺术生活,营造高校校园文化的氛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不仅是京剧爱好者们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同时通过这一活动,京剧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与弘扬。

(本文资料由宋恩瀚、庄宝仁、王拾敏、寇婉如、钟登富五位老师提供,图片由寇婉如、王拾敏、冷厚宁、江育璋等老师提供)

(责任编辑 杨程程)

“文革”中的吴宓

□文/徐洪火

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校“闹革命”。不久，吴宓先生办公室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吴宓先生走进教研室，看见墙上的标语不由一怔，他未说话，泰然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他。会上，几位教师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先生闭口不言，不置可否，于是有人领呼“打倒”口号，一阵“炮轰”，空气顿显紧张。我坐在最后一排，看不见他的表情。从后面看去，只见他一动不动，犹如老僧入定，似乎也并未怎么在意。对他这样的“老运动员”来说，批判似乎已习以为常。说真的，这次批判会是相当温和的，大家说话也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先生叫我留下，给我分配任务，要我晚上去找吴宓先生谈谈，松包袱，免得他想不通，出事情。所谓“出事情”就是自杀。当时有的老先生对“文革”那种惊人的阵仗很不适应，在大字报和漫画的“炮轰”声中，人格受到极大侮辱，还未等到由“触及灵魂”并进而触及皮肉的阶段就饮恨自杀了，死了还被骂为“自绝于人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当过一年半的“四清”工作队员，做“放包袱”的工作算是驾轻就熟。当晚，我到了吴宓先生家，他家中陈设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吴宓先生坐在小床上，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藤椅上。略事寒暄之后，我对他说：“下午大家对你的批判，你要正确对待。你要多学习中央文件，要实事求是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实事求是就是有什么问题交代什么问题，没有的事不要乱交代，这样会害人害己。”我一边说，他一边点头称是。我见他神情很平静，不像要

“出事”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家了。谁知当晚他就把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日记中，末了还加了四个字的评语：“此言有理”。后来先生日记被抄，看过日记的一位好心人将此情况告知我，我还着实吃了一惊，因为那时先生已“升格”为“现行反革命”了，他说“此言有理”那岂不糟糕？不免暗中埋怨他“糊涂”，要记就记“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一个、鸡卵二枚”之类，干吗把我说的话也记下来？不过还好，我没有“辫子”可抓，也没有人想从中“捞油水”，于我毫无影响。

9月上旬某日，吴宓先生被“革命小将”挂上“反共老手”的黑牌，抓去游斗，从此被关进“牛棚”，进了“劳改队”，各种“触及灵魂”的批斗会自是少不了他。1966年11月，监管“劳改队”的“革命小将”要去“革命大串联”，但苦于囊中羞涩，想到吴宓先生是高薪阶层，于是找他单独“训话”，意思是出钱，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吴宓先生虽然家无余钱，但岂敢抗命，东拼西凑，总算凑足了二百元。“小将”似嫌未足，临出发前还“借”走了先生手上那块并不名贵的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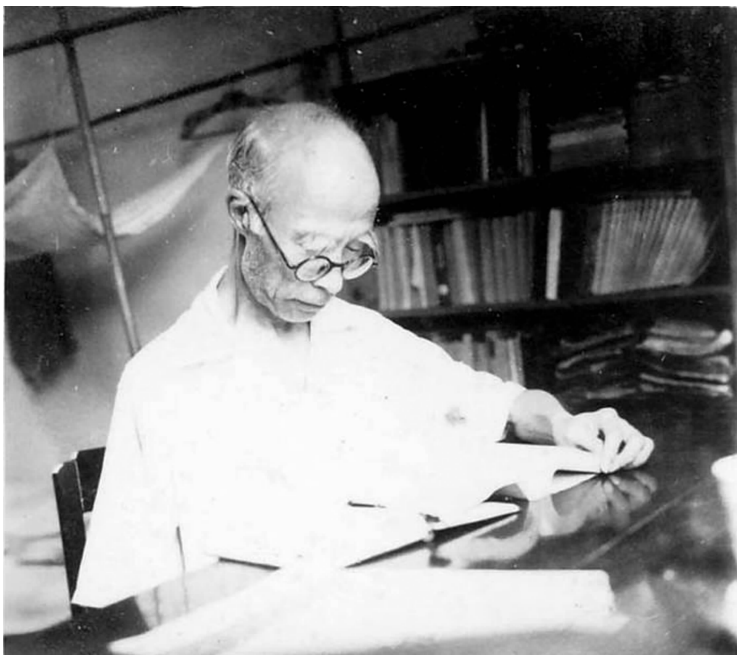
日记被抄，给吴宓先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经“革命小将”和“革命‘大’将”们的精心发掘，从吴宓先生日记中又找出不少“钢鞭”罪证，其一是说让中学生造反，无异让小孩玩刀，没有不伤手的；其二是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如何如何。仅这两条就不得了。在此之前，吴宓先生早已“升格”为“反共老手”。这一来再次“升格”为“现行反革命”，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各派办的报上不断发表批判“现行反革命”吴宓的大块“编辑部文章”，看那阵势，似乎很快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大概因为吴宓先生年纪太大的缘故，对他向来只是“触及灵魂”，免于触

及皮肉,所以,他也算平安熬过来了。大轰大闹一阵子之后,“小将”们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打“死老虎”毕竟远没有打派仗过瘾。

1967年6月开始,“革命小将”逐渐弃文斗而尚武斗。当时的时髦口号曰“文攻武卫”,这时谁也懒得来管“牛鬼蛇神”,吴宓先生等“一小撮牛鬼蛇神”在家“逍遥”。经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武斗期间,唯有“牛鬼蛇神”相对安全点。那时若被武斗人员抓住,开口必问哪一派,你知道他是哪一派?回答错了难免皮肉受苦。于是有人就冒称自己是“牛鬼蛇神”,对方立即申斥道:“牛鬼蛇神跑出来干啥?滚回家去!”一场凶险由此化掉。吴宓先生这段时间一直安居西师家中,虽然外面乃至西师校园内枪声不断,他却能在家中“安享清福”,谁也不去打搅,这恐怕是他在“文革”中过得最为安闲的一段时光。

“文革”中,随着吴宓先生身份的“升格”,有的“革命小将”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居然当面称他为“吴老狗”,在批判中也高呼“坚决砸烂吴宓的狗头”、“把吴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口号,喊归喊,其实并没有真正去砸“狗头”。但不少“小将”似乎特别偏爱他的光头,一见到他就要上去摸摸拍拍肆意侮辱。吴宓先生对此似乎特别不能容忍,遇此情况,总是用手护头,铁青着脸,一面躲一面逃,嘴里还唧唧啾啾,谁也听不清说些什么,显然是在发泄内心的极度不满。我多次见到这种情形,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但为了自身安全,只有快步离开。

1969年夏秋之际,西师中文、音乐、教育、物理4系师生赴梁平西师农场劳动锻炼,而吴宓先生之类的“牛鬼蛇神”则是去劳动改造,同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在当时,这叫做“革命、生产两不误”。农场在梁屏屏锦镇七涧桥。当时西师正准备在那儿筹建分院,不久,西师的部分教职工就搬到了那儿。一次,批斗吴宓先生,两员“小将”一人挟着先生一只胳膊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两人同时手一松,吴宓先生“扑通”一声重重跌在石板地上。这次他是真正被“打



吴宓¹

翻在地”了,无须“再踏上一只脚”,他的一条腿已被生生跌断。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下他真完了,75岁的老人哪能经受起如此痛苦的折磨。经过简单的治疗包扎,腿居然接上了,后来他也从极端痛苦之中熬了过来,拄着手杖居然还可以跛着行走,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但他走路“健步如飞”的情景从此成了历史。

1971年春,西师全校教职工集中在七涧桥搞“批清”运动。当时那儿刚开始建校,宿舍还未修起,男女老少一律住大工棚,上下铺,除了搞运动还要参加建校劳动,条件十分艰苦。“牛鬼蛇神”还要接受批判,日子就更难过了。“九·一三”事件之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不久,大家搬进了新修的宿舍,三人一间,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时,吴宓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最为明显的是记忆力急剧衰退。当时吴宓先生住一楼,我住二楼,休息时常到他寝室闲谈。先生总是坐在床上,闭目不语,有人进屋就睁眼看看,然后闭目冥思,用手指轻轻叩击脑袋,嘴里自言自语:“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连同教研室的教师他都忘了姓名,但《红楼梦》的回目却全背得,一字不错。我们试过,千真万确。

1972年开始,西师迁到梁平、忠县的教职工先后搬回北碚,1973年招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时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98-SX122-2.0014。

西大掌故

称“工农兵学员”。这批学生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是来“掺沙子”的。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师生混合编组,学习讨论,吴宓先生也每会必到,但从不发言。一次,在一教学楼 1202 教室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中途休息时,一学员走到吴宓先生面前,故意向他提问:“吴宓,你对‘克己复礼’有什么看法?”周围立即围了一圈人。我以为吴宓先生会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不想他竟然抗声回答道:“‘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围观者立即哗然,纷纷谴责吴宓先生“反动”,简直是“死顽固”。这事给我印象特深,可见他对真理的追求是多么执著!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吴宓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

记不清什么时候,突然听人说,吴宓先生老家陕西涇阳来人把他接走了。落叶归根,想必先生是很情愿的。1978 年春,传言吴宓先生已在涇阳老家去世。果然,有一天,在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由系领导主持,草草为吴宓先生开了一个追悼会。除古典组全体

参加外,外教研室参加追悼会者寥寥无几。追悼会极草率,不到二十分钟即宣告结束。当时我很感慨,想不到一代宗师、名流学者的追悼会竟会如此草率、冷清。但想到这大概意味着给吴宓先生平反,恢复名誉,心里也就慢慢释然了。后来,外地学者对吴宓先生遭受的冷遇公开表示不满,西师又在东方红图书馆再次给吴宓先生开了一个高规格的、像模像样的追悼会。一个人死后本单位为之开两次追悼会,这则是吴宓先生的“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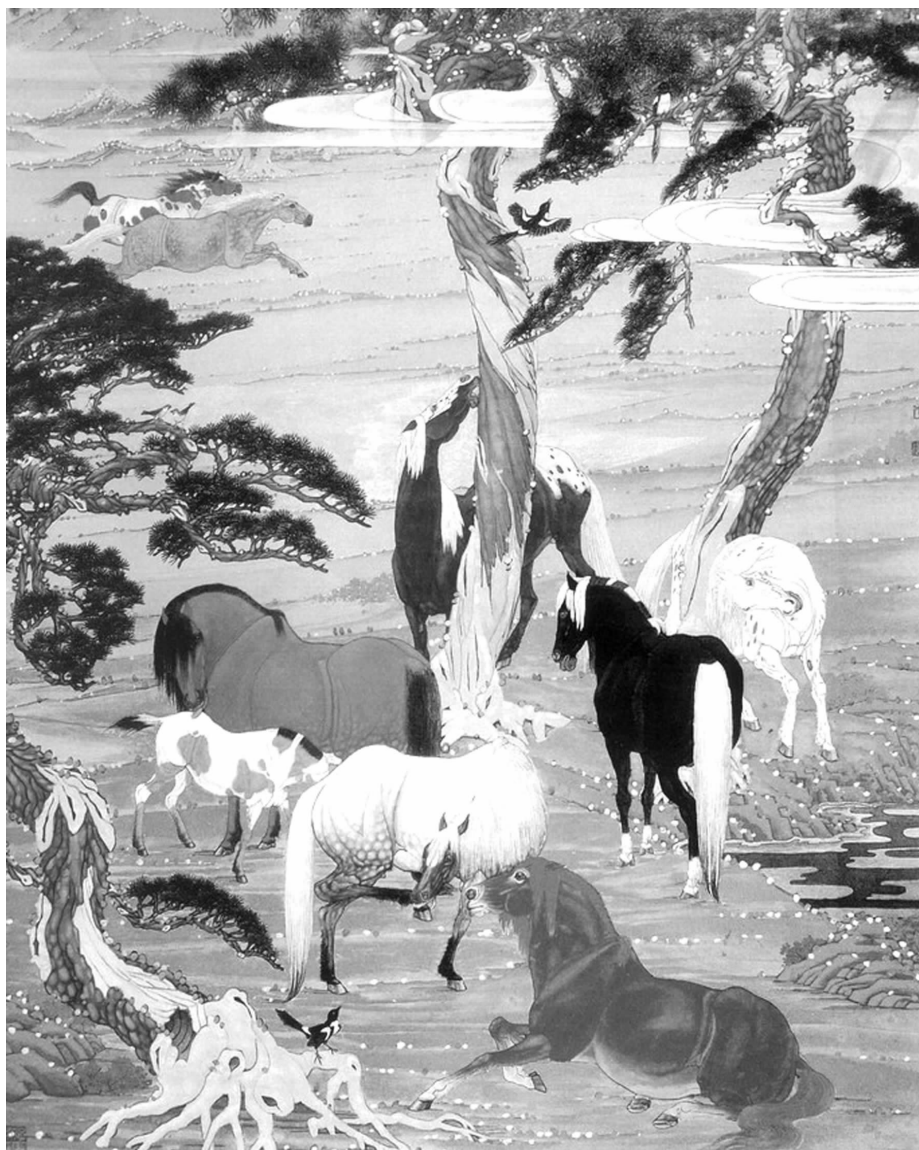
吴宓先生乃学界名流,一代宗师,年轻时名誉昭然,蜚声海内外;晚年遭遇“文革”,备受摧残,晚景凄凉,郁郁而终。时欤?命欤?吾与先生交浅言少,对先生思想、学术、道德、文章,不敢妄评。谨述先生一些零星琐事以兹纪念。先生九泉有知,必当谅我。

(本文选自《那时 那人 那些事——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爱马成癖的李际科

□文\方凤富



九骏图(工笔重彩画 1994年)¹

人世间爱马者多矣，有几人能像他一样爱马成癖！他叫李际科，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美术系教授，生前以画马名世。美术评论家、清华大学教授徐培晨认为，李际科先生以《早春初牧》为代表的作品，“达到了时代的空前水平，堪称独步当代的工笔画杰作。其分量不可小视，许以国宝”。“李先生的工笔马，徐悲鸿的意笔马，可以说是殊途异趣，各臻其妙。”

李际科生于1917年，尚在襁褓

中即被徽商李葆臣抱养。虽说是养子，聪明伶俐的李际科却得到养父母的疼爱，获得了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更为优越的读书、学画的条件，少时即表现出丹青才能，对雄姿英发的骏马更是画而不厌。考入国立艺专，直接受教于潘天寿、吴笈之、张振铎等先生，其画马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李际科爱马至深，画马成癖，读国立艺专时，曾天天骑马去上课，这被别人看做顽劣恶习的行为，竟然

得到像潘天寿那样的名师大家的理解。

那是在国立艺专迁址昆明安江村的时候，李际科变卖衣服买了一匹黄骠马，他每天骑着马去学校，每当上课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同学们总能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都知道又是李际科骑马上课来了。本来，李际科卖衣服买马就为有些人所垢病，骑马上课的出格行为更是引起种种非议，认为李际科贪玩，不务正业。

潘天寿先生很快知道了这事。一天课后，李际科出了教室，正向拴在操场坝边的黄骠马走去。潘天寿先生走了过来，指着那匹黄骠马，主动问起李际科：那马儿就是你变卖衣服买的吗？你每天都是骑着它上学放学吗？潘先生问话的时候盯着这匹膘肥体壮的马，目光很柔和。李际科将自己从小就喜欢动物，特别偏爱马，也很想把马画好，因为没钱才变卖衣服换了马的经过老老实实地向先生作了坦白。潘先生听了，很是赞赏，要李际科向徐悲鸿学习画马，博采众长，开阔视野，画出属于自己的“马”来。

在潘天寿等老师的支持下，李际科画马更勤，用心更专，他创造性地用各种不同的绘画技法表现马，同学们为他取了“马癖”的外号，李际科也自刻闲章一枚响应：好马成癖，自己也以“一癖”自称了。

在后来的岁月里，李际科为了笔下的马四处奔波。毕业后他为了观察西北马选择了去甘肃武威青云中学任教；1945年他辞去重庆艺专教职，去四川奉节青莲乡任教，也是因为那里有马可画；1946年，李际科从奉节买舟东下，到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为的是那里有日军投降后留下的东洋马；1948年，他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也是因为那里有他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云南马。甚至与夫人的相识相爱，也是因马结缘，以马为媒，后来陆续有了五个孩子，也全部用了骏马称谓：龙骧、龙媒、龙文、龙驹、龙燕——五“马”奔腾，传为佳话。

李际科先生画马代表作品有《骏发》《早春初牧》等。

《骏发》创作于三年困难时期。该画没有上色，纯粹白描，其构图洗炼简单，线条如行云流水般流畅：马的前蹄腾空而起，骏发风扬，卓然不群；仰天长啸，潇洒不拘。这幅创作于20世纪中叶三年困难时期的作品，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美感，催生出克服时艰、奋发向上的激情。

《早春初牧》创作于1976年春末。那年李际科到阿坝草原体验生活，看到广阔无垠的草原，坦荡如砥，万马奔驰，牦牛成群，残雪渐消，新草吐绿，一派早春景象。先生触景生情，激动不已，萌生了表现草原现实生活的强烈愿望。他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凛冽寒风中只顾写生，忘了寒冷，忘了保护冷得抽搐的双腿。返校后，李际科在双腿已冻伤化脓的情况下，仍以最大的热情和超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这幅巨作。《早春初牧》受到画界高度推崇，美术评论家徐培晨先后两次在台湾地区的《世纪论坛报》上撰文评介《早春初牧》，认为它“不同于宋元画马的轻柔单薄，更有别于郎世宁的西画气息过重，而是在汲古与创新的道路上有了新的巨大建树，自成一格。画面厚重、浓丽、丰富、热烈、奔放，有着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和强烈的时代精神。……达到了时代的空前水平，堪称当代工笔画杰作”。

1994年，李际科先生在身体已经十分羸弱，受白内障影响、视力大减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幅以马为题材的作品——表现少陵诗意的工笔重彩画《九骏图》。

从24岁画《七骏图》到77岁画《九骏图》，50余年的时空阻隔丝毫没有减少他对马的一往情深。

（本文选自《那时 那人 那些事——西南大学漫话96则》，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¹ 图片来源：中国人人网，<http://www.cnrr.cn/rrys/yshh/zgms/zgms46003.htm>。

高显鉴创办《现代读物》

□文/张晓华

那是1936年的元旦,因为放假而难得有闲的高显鉴先生和几个朋友围坐在火炉边闲谈。他们从古中外的问题谈到中国的文化,再从中国的文化谈到了中国的出版物。高显鉴有感而发:在座诸位都是省内外大学毕业的,具有相当的学识,又都是四川人,既然感到四川省的文化不竞,就不应坐视不理;既然认为四川省在文化事业上尚似一片荒土,就应当自己起来做些垦荒的工作。在这之前高显鉴曾多次谈到四川省应多办刊物,将四川的一切介绍出去,把省外的一切交换进来,以求从文化上帮助建设新四川,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办起来。通过这次“围炉闲谈”,大家的认识更加统一起来,立即对刊物的名称、内容轮廓及形式、具体实施办法等都一一进行了讨论。大家认定这个刊物将来要肩负重大的使命,内容不应太专门、太狭小,于是便将刊物命名为《现代读物》。同时,大家一致推举高显鉴任社长兼发行人,编辑与工作人员则主要从川教院、金陵大学的教授、专家学者中聘定,其中包括陈剑恒、乔启明、沈经保、王欲为、杜元载、赖均伯、周今明、刘景源、胡九皋、赵幕归、戴溶江、张宿恢、陈定宇、叶锡纯、陈伟芬、杨凤思、饶克昌以及画刊编辑维青等人。随后,高显鉴在重庆大梁子创办了肇明印刷公司,特地从上海聘来高级技师,并订铸新五号仿宋、汉文正楷等多种字模,同时还开展印图书表册、五彩商标等业务。在高显鉴等人的努力下,《现代读物》办了起来。1936年元月,《现代读物》创刊号正式出版。无论是内容还是刊物的装帧、印刷,《现代读物》均属质量上乘,口碑极佳,在当时全国的众多期刊中独树一帜。



抗战时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现代读物》

随着抗战的开始,作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刊的《现代读物》担负了更多重要的使命,除了沟通和交流川内外乃至国内外的信息、传播科学技术,更以其鲜明的批判意识针贬时弊、抨击国贼,唤醒民众驱逐倭寇、强国富民,同时还为各种意见群体提供了一个各抒己见的交流平台,受到人们的欢迎。

《现代读物》1936年创刊,1946年停刊,整整10年,横贯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整个阶段,从民间的角度见证和记录了整个抗战历史。

(本文选自《那时 那人 那些事——西南大学漫话96则》,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西师：迁来北碚办大学

□文/邓力

西南大学办公大楼，几年前冠名为行署大楼。其实这行署大楼并不是另行取名而是还原，因为早在1952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搬来此地办学之前，这栋大楼就是名副其实的“行署大楼”——川东行署的办公楼。当年西南师范学院选择在川东行署这片风景胜地办学，得益于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调整，更有赖于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要把好地方拿来办教育”的英明决定。

川东行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设立的省级行政单位。1950年1月，为便利行政管理，中央决定，将四川省划分为四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即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川东行署驻地就在北碚。1952年9月1日，中央决定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等四个行署，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川东行署撤销后，空出了偌大一片土地和办公用房。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正举，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急需办公场地，川东行署空出的这片土地和气势恢宏的办公楼自然成了众多单位争要的对象，报告纷纷飞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其中就有西南师范学院的申请。

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正在为校舍犯愁。学校不是没校舍，而是校舍分散，不利于办学，因为当时的西师是刚刚由两所大学共同构成的。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的成立，标志着西南地区第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西南重镇重庆诞生。两校合并之初，校址分散在距北碚40多公里之外的九龙坡、

磁器口、沙坪坝等地。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在重庆大学对面划拨了400亩土地给西南师范学院，建起了5幢教学楼和9幢宿舍。然而办学地点分散、校本部面积狭小、毗邻闹市区、没有发展余地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川东行署撤销时，正在为此犯愁的西南师范学院看到了一线希望。

原川东行署故地，它最后的主人究竟是谁？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永青（后来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回忆，当时面对众多单位递交的那一份份要地要房的申请，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作出指示：要把好的地方用来办教育。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原川东行署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划给西师。于是，在西师的校史上便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1952年9月21日，西南师范学院师生员工水陆并发，陆续从九龙坡、磁器口、沙坪坝向北碚迁移。

在此过程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搬家记忆：

9月的重庆，暑气还没被季节的凉风扇退。清晨，我们搭乘运送教具的轮船从九龙坡出发，经朝天门两江交汇处，溯嘉陵江逶迤北上。当船泊北碚江边时，已是繁星点点了。江边的渔火被墨色的水波扭成长长短短星星点点的碎片，桨不划，橹不摇，但听流水轻轻拍着船板。我们几位负责押运教学器材的年轻人在船头伫望，大家都不说话，但心里却在一遍遍地想，西南师范学院的新家，是什么样子？北碚我们从来没去过，半个月前，听说学校要北迁的消息后，大家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家实在想象不出西南师范学院新校址的样子，难免有些忧心忡忡。然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南师范学院大校门¹

沙坪坝由陆路先行一步到北碚的师生已经发现,西南师范学院新的家,在缙云山下,校园面积大,占地数千亩;绿树新楼,景色美极了……

从 9 月 21 日开始的大搬家,进行得非常顺利:

1952 年 10 月 2 日,西南师范学院北碚办事处成立;

1952 年 10 月 9 日,院部行政机关及干部迁至北碚;

1952 年 10 月 10 日,西南师范学院正式在新校址办学。

20 天,仅仅 20 天的时间,学院完成了由九龙

坡、磁器口、沙坪坝向北碚的历史大搬迁,一个分散的西师,终于团聚在一起,开始新时代新校园的新生活。

西南师范学院迁址北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 1954 年底,经过几次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学校规模迅速扩大,教职员工数量达到 500 多人,学生 1670 余人,增加了一倍多,成为全国系科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本文选自《那时 那人 那些事——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1.0088。

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的路径研究

□文/陶莉¹

互联网的诞生和运用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成为社会进行信息传递、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系统,宣告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强烈吸引和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与需求。校史作为学校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学校成就的浓缩精华、学校传统精神的映射和风格特色的集中体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新媒体给校史传播带来的巨大机遇

关于新媒体,专家、学者以及媒介实务的工作人员都做过不少的定义。一般而言,新媒体是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极大扩展、传播速度极大加快、传播方式极大丰富、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新媒体所具有的数字化、大容量、易检索、高交互等优势特性,在校史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更具时效性

美国网络专家威廉·奥尔曼曾说过:“信息革命带来的最基本的变化是,它有能力以甚至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的方式,使人们紧密联系,消除‘这里’和‘那里’的界限”。传统传媒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传播信息相对缓慢。而新媒体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突破这些限制,它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而且传播成本廉价。传播力决定其影响力,借用新媒体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特点,学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通过文字、语言、图片等方式,将校史中品质优良

且易于近人的校史文化产品传送给人们、解释给人们,从而促使校史的育人作用快速凸显。

2、更具多样性

传统媒体的校史传播,往往把内容变成干巴巴的教条和简单的说教,这样使得校史对受众毫无吸引力。新媒体具有大容量、可贮存、可链接的能力,并具备多媒体特性,可以通过多种音像载体,将大量校史资源转换成能为光符号系统和声音符号系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般得到切身体验,不仅“见其人”,而且“闻其声”,所以它产生的印象就比单一载体的传播所产生的印象更深刻、更全面,受传者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也更清晰、准确、全面,进而引导受传者从丰富多彩的符号中深入理解所传播内容的精神实质,有利于以校史传播目标的最终实现。

3、更具交互性

传统的校史传播往往采用灌输的方式去震撼和征服受众,在大众传媒发展较弱、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较为单一的时代,发挥了信念教育和思想统一的作用。但在传媒发达的信息环境中,这种方式不仅在感觉上相距甚远,遥不可及,而且在影响、引导受传者方面作用较弱。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具有一对多、多对多的相互对话的特点,表现出传播与阐释二元互动的文本意义交流结构。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加强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可以营造出一种“对话”的意境。充分运用新媒体的交互功能开辟互动平台,进行校史传播,促进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互动式和自由式的沟通,有助于引导人们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文化灌输转变为主动参与文化交流,使受传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校史承载的思想观点的感染,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¹ 作者简介:陶莉(1982年3月出生),籍贯江苏省靖江市,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位东华大学。

从而构筑受众的精神世界。

4、更具大众性

在校史传播中,传统媒体和文艺形式在吸引受众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对校史感兴趣的群体会主动去寻求和参与,但是对于没有兴趣和没有经历过相关历史的人群来说,则很难实现全覆盖。新媒体具有巨大的潜力,它能够终将庞大的人和知识联接在一起。因此新媒体的网络服务,正好突破了受众的离散时空的限制。新媒体通过非连续和零散的时间与空间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以扩大受众群体,可获得校史传播的更佳效果。

二、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面临着严峻挑战

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壁垒。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媒介,人们可以“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进行大众传播,这也使得校史传播面临着严峻挑战。

1、对传播者素质的挑战

校史传播者是校史传播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既决定着校史传播的存在,又决定着校史传播内容的数量和质量、流量和流向。因此,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了校史传播的效果。校史传播者虽然可能在工作 and 生活中接触过一些新媒体,但往往对于新媒体的最新技术、传播特征、工作方式、应用领域等并不甚了解。如何熟练使用新媒体、驾驭新媒体,及时解决校史传播中的问题,是迎接新媒体挑战的必然要求。

2、对传播内容的挑战

文字、声音、图像三大类信息构成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内容。以网络为主导的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域、存储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具有可贮存、链接、传输海量信息的能力。而传统媒体下校史传播大多通过文本形式进行,传播信息量非常小,传播内容单一和片面,这使得传统的校史传播吸引力不强,效果弱化,不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合适的传播内容有利于优化传播的效果。如何深入挖掘校史资源,丰富校史传播内容,是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3、对传播方式的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新媒体包括:博客(blog),播客,维客,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电子邮箱,网站,网络杂志,网络报纸,移动多媒体(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游戏、手机电视、手机电台、手机报纸等),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电网上网,温暖触媒列车电视,楼宇视屏(各种大屏幕),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对话链(Chatwords),虚拟社区等等。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些种类繁多的新媒体,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载体,开拓新的传播方式,将校史传播工作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总结。

三、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的路径构建

如前所述,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给校史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的校史传播,和传统媒体环境相比有着不同的需求,可从以下五方面重新构建传播路径。

1、统一观念,推进校史传播的理念建设

校史可以为学校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历史借鉴,更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爱校教育增添生动的历史教材。因此校史传播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校史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活动,可以充分发挥校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作用,不断增进学生对学校的感情,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无形中影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是开展校园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广大学生无疑是校史传播的主要对象,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才,是校史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传播学校文化的最重要的教育成果。因此,全体校史传播者都应把“育人为本”作为最高的传播理念。

坚持“育人为本”的传播理念,就是以人才培养作为校史传播的根本任务,坚持一切为了调动广大受众的积极性,坚持一切为了受众的成才。落实“育人为本”,当前就是要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对“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潜力,弘扬中华文化,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占领网上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这一战略部署上来,把党中央的精神变成校史传播者的共识,这是做好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2、优化队伍,为校史传播提供组织保障

校史传播者是校史传播活动的直接推动力。有了高素质的传播者,校史传播活动才能顺利开展,新媒体传播媒介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才能实现校史传播的目标。因此加强校史传播者队伍的建设,才能为校史传播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首先要加强校史传播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建设。校史传播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要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站在有利于学生成才、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立场上。

其次要加强校史传播者的文化素质建设。校史传播者不仅要了解校史方面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传播学等。

第三要加强校史传播者的新媒体技能建设。新媒体的各项技术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校史传播者要不断学习其相关的各项新兴技术,并能解放思想、创新形式,将这些技术运用到校史传播中,增强校史传播的有效性。

同时要加强校史传播者信息监管能力建设,要能够以高度的敏锐性来采集信息、鉴别信息、选择信息、加工信息和传递信息,从而正确引导受众。

3、转变机制,增强校史传播的交互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校史传播的机制应该积极由“灌输制”转型为“对话制”,吸引受众主动参与交流,碰撞思想,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校史的引导、感召。例如,学校在建设校史专题网站时,应彻底改变传统的单向强制性方式,不是简单的“你讲我听,你打我通”,而应通过bbs等形式开通交流版块,这样受众可以随时随地与网站开展思想交流,从而袒露真实想法。同时,校史专题网站还可根据受众反馈的思想动态和意见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和引导,可大大提高校史传播的实际效果。在网络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平等的,信服什么、崇拜什么,主要看真理掌握在谁的手中。通过这种互动式、引导式的宣传教育,能够获得受众的真实思想信息,有效地化解受众的抵触情绪,可以反过来提高思想“灌输”的有效性。

4、丰富内容,提高校史传播的有效性

传播效果是传播内容作用于人类心理系统的结果,传播的内容是生产传播效果的原材料。要深入挖掘校史的教育资源,丰富校史传播内容,首先应形成

适于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校史文化内容。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校志或校史修撰时重“编”轻“写”的做法,不是仅满足于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与堆砌,而是力求形成品质优良而易于近人的校史文化产品。学校应积极采取行动,全面整合资源,加强对校史的研究整理,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固化为文字、音像、图片等可触可感的有形文化产品。特别是在校史文化图书编撰方面,强调要统筹兼顾人文性、史料性、实效性和可读性,在选题立意上力求体现学校鲜明的地域风格特征和办学特色与传统,以期用厚重的历史传统与大学精神感召人、引领人、启发人;在布局谋篇上力求做到题材选取精准、结构新颖独特、表现形式生动,以期更好地贴近读者、引起共鸣。

5、拓展形式和载体,增强校史传播的影响力

新媒体形式和载体的多样性,可进一步增强校史传播的影响力。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接受外来信息有83%是通过视觉感官实现的。网络语言具有图文融汇、声情并茂等特点。通过这种信息表述,可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声色俱全,感染力极强。校史传播可以选用网络“多媒体”技术,通过音频、视频等制作手段,打造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产品,在屏幕上创造一种愉悦、轻松、活跃的情景,使严肃的宣传教育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让人们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情境中学习校史,使受众在图文融汇、声情并茂的语境中感知校史,从而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进而达到思想的升华。

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学校应积极拓展校史传播的载体,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媒介,开通校史博客、校史微博、校史手机报、校史网络杂志等,随时随地开展校史传播工作。信息网络的便捷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感染和激发着人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可最大限度地调动受众获取信息的自主性和参与性,从而增强校史传播的影响力。

总之,校史传播在增强对广大师生的教育和引导、推进学校建设、增强学校软实力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文化大繁荣的战略部署,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校史传播应该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力量,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创新,继续探索传播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以切实促进校史传播效果的全面提升,实现校史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文/姜海庭

编者按：它是唯一设立于高校的鲁迅纪念馆；它是存在于学生中的鲁迅纪念馆；它借鼓浪屿之水的七分灵气，赢得十里美誉；它规模虽小，却以几十年的坚持与创新，树立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传承着中华的民族魂。这里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签名，有宋庆龄、曹禺等名人大家的亲笔题词，更有百万人次的国内外参观者留下的足迹。“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它就是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的文学巨匠，重要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他的“匕首”、他的“硬骨头”、他的“民族魂”，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承。在他生活和战斗过的许多地方都建有鲁迅纪念馆，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鲁迅纪念馆有北京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州鲁迅纪念馆，而位于福建厦门大学集美楼的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则是唯一一个设立于高校的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的成立与发展

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与国学研究院教授。在厦大期间，鲁迅先生起初住在生物学院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不久即迁居校园中心的集美楼。这栋楼是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校之初自行设计的首批校舍之一。在短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正门¹

短的一学期里，鲁迅先生除了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教学与国学研究工作外，他还撰写了17多万字的评论、杂文、小品、随笔以及其它文学作品。此外，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为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平民学校和中山中学师生讲演，广泛接触厦

¹ 此图片来自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xmu.edu.cn/bj/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4>。

他山之石

各界来访人士,为改善厦门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为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纪念鲁迅对厦门的贡献,弘扬鲁迅的革命精神,1952年10月19日厦门大学将集美楼二楼辟为鲁迅纪念室。1956年,为纪念鲁迅诞辰75周年、逝世20周年以及到厦门大学任教30周年,对原来的鲁迅纪念室进行重新整理,并增设陈列室一间,陈列鲁迅在厦门的著作及有关资料,纪念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字。

1976年10月,在全国各地鲁迅纪念馆的支持下,厦门大学对鲁迅纪念馆进行全面整修,补充大量从全国各地征集、复制来的照片和纪念文物,又增辟了三间陈列室,纪念馆扩大到集美楼二楼整层的六个房间,并将鲁迅纪念室更名为鲁迅纪念馆,采用郭沫若先生的题字。1981年为迎接校庆60周年和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1996年为纪念鲁迅到厦大任教70周年,1999年为迎接校庆80周年,纪念馆曾先后三次作了调整和完善。2006年,在“厦门大学走向世界”的校庆85周年活动中,为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和到厦大任教80周年,在周海婴先生的支持以及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大力协助下,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再次进行整修和布置。这次重修突出了鲁迅先生在厦门时期的史料,并增设了“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览室。自2006年4月重修开馆后,此馆凭借独特的展览风格以及一系列的鲁迅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日益提升。

全国唯一设立于高校的鲁迅纪念馆

作为全国鲁迅纪念馆中唯一设立于高校的鲁迅纪念馆,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虽经费有限、规模较小,但五十年来始终坚持办出风格与特色,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6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特地到纪念馆瞻仰。1991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视察厦大时,也特地到纪念馆参观,并留下亲笔签名,楚图南、童小鹏、曹禺、贺敬之等著名人士也先后参观并题字留念。该馆自正式开馆至今,已接待了百万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²

人次的国内外参观者。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现有5个展室,其中四室以六百多件文物和资料、照片,分别介绍鲁迅的生平和在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各历史时期的战斗历程,其中厦门部分是展出重点。

第一展室为鲁迅生平展室,简要回顾鲁迅的人生轨迹及思想历程;

第二个展室为鲁迅与厦门大学展室,陈列着鲁迅在厦门时的历史文物资料。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创作和革命实践是他一生事业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展室中展出的由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发现并且捐赠的文学刊物《鼓浪》创刊号及第五、六、七期原件,改变了《鼓浪》只出六期说法,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鼓浪》是1926年在鲁迅支持下创刊的厦门大学学生刊物,当时是做为报纸的副刊发行的。以前专家根据调查一直认为《鼓浪》只出过六期,第六期是做为“送鲁迅先生专号”发出的。但后来找寻到的原件证明,《鼓浪》还出过第七期,而且第七期是做为继第六期“送鲁迅先生专号一”发出的“送鲁迅先生专号二”,从而改变了《鼓浪》只出过六期的说法,也改变了“送鲁迅先生专号”只有一期的说法。

第三展室是“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室,陈列着鲁迅和许广平的部分生活用品。这个专题展览室是在周海婴先生建议与授权下增设的。《两地书》是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见证,专题展室以《两地书》为中心,对他们的感情生活做了回顾。展览由四个部分构

² 此图片来自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xmu.edu.cn/luxungu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01>。



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挽联³

成,分别是“我可以爱”、“十年携手共艰危”、“锲而不舍”和“跟着鲁迅的足迹”。展室展出了很多周海婴捐赠的珍贵藏品,有鲁迅离开厦大前与林语堂等人的合影,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手稿复制品,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寄给许广平的一张明信片,许广平替鲁迅编织毛衣的毛线和衣针,鲁迅的烟斗、烟盒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木制行李箱,从许广平当年北上读书,到与鲁迅先生相识、相知、相伴,这个行李箱一直不离左右,弥足珍贵。展室的重要展品还有鲁迅和许广平的手迹,包括《读〈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答客诮》《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风子是我的爱》《鲁迅夫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第一次通信、许广平手抄鲁迅杂文《阿金》、许广平致鲁迅的第一封信(1925年3月11日)以及鲁迅复许广平的第一封信(1925年3月11日)等。厦门,是鲁迅摆脱旧式婚姻樊笼的第一步,是鲁迅人生旅途中的重要转折点,增设这样一个专题展室,可以让观众对这一时期的鲁迅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的专题展室,在全国鲁迅纪念馆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个展室是纪念室,里面有全馆的镇馆之宝——五幅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厦门文化界举行悼念活动所用的挽联和挽幛;

第五个展室是鲁迅故居,室内摆设全部按鲁迅当年居住时的原样陈列。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一个

书架、几张木椅,以及日常所用的箱子、衣架等,十分简朴。鲁迅先生曾在这里创作故事新编《铸剑》、《奔月》,写下《汉文学史纲》,编辑《坟》,撰写杂文、书简、日记,同时还从事一些翻译工作。

在这五个展室中,第二、第三个展室是全馆展出的重点,也是有别于全国其它鲁迅纪念馆的地方。

存在于学生中的鲁迅纪念馆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存在于学生当中的鲁迅纪念馆。

2009年9月19日上午,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举行的“福建省2009年暨厦门市第五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开幕式上,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被厦门市委宣传部和厦门市社科联命名为“厦门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此次与厦门市博物馆等8个单位同时成为厦门市第二批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既代表着社会各界对鲁迅纪念馆长期以来大力弘扬鲁迅精神、传播校园文化工作的肯定,也标志着它在承担提高广大市民社会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使命方面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厦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肩负着对全市大中小学生进行课外教育的重任,并且长期作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研基地,有着特殊的学术功能,《现代文学作品选》、《现代文学史》课



鲁迅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品⁴

³ 此图片来自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xmu.edu.cn/luxungu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05>。

⁴ 此图片来自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xmu.edu.cn/luxungu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04>。



全国鲁迅纪念馆馆际交流会与会代表在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门前合影留念⁵

程在此作实地讲授，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在此开展学术研究，当年鲁迅指导下创刊的学生刊物《鼓浪》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在全国大学生刊物的评选中屡获殊荣。此次 2006 年 4 月全新开放后，厦大鲁迅纪念馆充分发挥高校的独特优势，长期由优秀学生参与日常管理以及全面负责对外接待、讲解。

目前，纪念馆主要由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管理，日常开放、讲解及接待工作全部由学生负责，这样既能保证纪念馆的正常开放，也为部分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鲁迅纪念馆自正式开馆至今，已接待了百万人次的国内外参观者，其中最多的是来自厦门周边的中小学学生以及文化机构人员。

近年来借助厦门大学良好的发展契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1 年校庆期间在面向社会开放之余，推出了“厦大中文系 80 周年科研成果展”；2001 年 9 月鲁迅诞辰 120 周年之际，与人文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了福建省大学生“鲁迅在我心中”的征文大赛，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国内外媒体纷纷予以报道。

2008 年 10 月，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代表向厦

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赠送了“鲁迅医学笔记·脉管学”翻印本。“医学笔记”，正是鲁迅在仙台学医期间的课堂笔记，其中留下了藤野先生批改过的痕迹，不仅对鲁迅研究来说是重要的资料，而且在研究日本明治时代的医学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009 年全国鲁迅纪念馆馆际交流会在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绍兴、广州等地的鲁迅纪念馆同仁聚首厦门大学，就当前鲁迅研究工作的最新动态、文物资料的征集与保护、免费开放对策和措施、馆际互助联动与跨区域学术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作为唯一设立于高校的鲁迅纪念馆，作为存在于学生中的鲁迅纪念馆，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立志把弘扬鲁迅精神放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树立崇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当好鲁迅研究与文物保护的守望者，做好“民族魂”的传承者。

(责任编辑 肖艳)

⁵ 此图片来自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xmu.edu.cn/luxungu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51>。